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布爾戰爭對霍布森帝國主義理論的影響

The Influence of Second Boer War on John A. Hobso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曾沅芷

Yuan-Chih Tseng

指導教授：楊肅猷 博士

Adviser: Su-Hsien Yang, Ph.D.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January 2015



謝辭



我得以完成本篇碩士論文，最大功勞必須歸於指導教授楊肅猷老師，老師給予我許多實際的建議與鼓勵，並能信任學生，使我得以自由發展研究方向。楊老師也多次給我助理工作機會，使我得以在埋首於論文寫作之外，保持人際交往與從工作學習的機會。本論文的題目訂定，則必須歸功於自文獻回顧時即擔任口試委員的陳正國老師，老師能直指我的思考盲點，協助我釐清思緒與問題意識，使論文的研究方向得以更為精確而不失研究本心。擔任口試委員的周樑楷老師，也給予我相當多寶貴的建議，讓我有更多精進的機會。而我能夠順利完成碩士班學業，還必須感謝劉慧老師、秦曼儀老師、花亦芬老師與呂世浩老師，我自他們提供的助理工作機會獲益良多。特別是劉慧老師，因為她的信任，我才得以度過碩士班初期失去方向與自信的艱困；工作以外，她也對我的學業給予關懷與支持。謝金蓉老師教授的英文史學寫作，對我的學術寫作與思考有極大的助益，在此也必須特別致謝。

本論文的構思與寫作過程，則備受歷史學研究所學長姐與同儕的照顧，在此必須致上感謝。尤其是在發表會擔任評論人的陳建元學長，願意耐心地給予我論文初稿指教。施昱丞學長與黃昱翰學長在我坐困愁城時給予許多實用的建議與批評，是本論文概念與論述成型的重要協助者。與吳鴻誼、鄭庭鈞兩位好友多次的討論與交流，提供了我寫作與思考的無數靈感。林琮舜則多次提供我論文寫作格式的資訊與方法，對健忘且粗心的我極有幫助。我還要感謝歐陽宣學長、許雅玲學姊、陳力航學長、張瑋麟學長、周孟綦學姊的提攜與關懷，薛名秀、蔡濟萍、李巧伊、宋彥陞、謝仁晏、陳妍希等大學好友至今持續的友誼與關心，李柏賢、楊承叡、劉牧菁、李筱萱、宮啟崑、陳育麒、李靜慧、瞿正瀛賢伉儷等研究所同學的交流與互相扶持，以及周姿吟、林芯彤、許逸涵、鄭宇晴、黃紳原、曾婉甄、黃若瑤等學弟妹在教學助理工作上的諸多貢獻與幫助。而完成碩士班學業與助理

工作的諸多流程，則須歸功於臺大歷史系系辦公室全體職員的辛勞，他們的工作為本系學生提供了一個良好自在的學習環境。我特別感謝呂怡燕助教，她對在處理事情格外脫線的我極有耐心，沒有她的幫助我恐怕難以順利畢業。

本論文得以有任何成果，尚須歸功於環境造就。在此必須感謝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大學優良的學術環境與豐厚的圖書資源、開放全球通路且價格合理的 The Book Depository 與英國皇家郵政(Royal Mail)、以及這個數位資料日益齊全的網路時代。沒有這些資源與條件的協助，本論文幾乎不可能在臺灣完成。這些功勞也應歸給在臺灣與世界各地推動資訊透明化、學術自由化、數位化，以及在數位時代之前就努力不懈引介國外學術書籍的前人們。

最後，要向我的家人致上最大謝意，他們願意包容、支持並陪伴選擇歷史學研究這條不討喜的道路的我，就是我持續前進的最大動力。父親經常與我討論國際政治與經濟議題，我論文中對帝國主義與經濟學的興趣亦萌發於此；母親總是給予我睿智的人生建議，也為了讓我能專心研究包辦了我應盡的家務，這是我之後亟需補償的；弟弟在這幾年廚藝精進，使我們常有口福，他在娛樂與通訊產品上的良好品味與資訊收集能力也助我良多。僅將這篇論文獻給他們。

摘要



本論文的目標，乃欲闡明霍布森在第二次布爾戰爭(1899-1902)中的經驗，與他著作的反布爾戰爭作品，如何影響他的《帝國主義》一書。約翰·阿特金森·霍布森(1858-1940)最知名的作品《帝國主義：一份研究》(1902)，分析西方先進國家帝國主義擴張行徑背後的資本主義動機，並批判帝國主義對受壓迫殖民地與帝國本身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傷害。由於《帝國主義》一書最早出版於1902年，即為第二次布爾戰爭結束的同一年，許多《帝國主義》中的論點，尚可追溯到霍布森的反戰作品中，如《在南非的戰爭：原因與效應》(1900)，與《好戰主義心理學》(1901)。霍布森在《帝國主義》中對帝國主義擴張背後的資本主義勢力的論證，乃遵循他在上述兩部反布爾戰爭著作中，分析南非資本家、英國政府與英國媒體關係的論述邏輯。這表示霍布森在南非的採訪經驗與研究，對他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理論的成形大有影響。經由比較霍布森的反戰著作與《帝國主義》，我們得以更加了解霍布森帝國主義理論的歷史脈絡，以及十九世紀晚期自由主義思想的轉型過程。

關鍵字：帝國主義、約翰·阿特金森·霍布森、第二次布爾戰爭、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好戰主義、英國帝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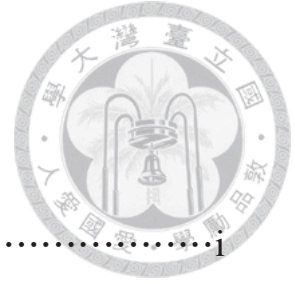
Abstract



This thesis aimed to illustrates how John Atkinson Hobson (1858-1940)'s experience in the Second South African War (also noted as the Second Boer War) and his anti-Boer War work had influenced *Imperialism: A Study*. Hobson's most famous work, *Imperialism: A Study*, analyzes the capitalistic motive behind imperialistic expansion of western advanced nations, and criticizes the damage that imperialism has brought upon the oppressed colonies and the empire itself. Since *Imperialism* was published first in 1902, when the Second Boer War ended, many of the arguments in *Imperialism* could still be traced back to John A. Hobson's own anti-Boer War work, like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Its Causes and Effects* (1900) and *The Psychology of Jingoism* (1901). Hobson's demonstration of the capitalistic forces behind the imperialistic expansion in *Imperialism* is following his discours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outh African capitalists, British government and British media in the other two books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Psychology of Jingoism*. This implies Hobson's experience and investigation in South Africa during the Boer War, has had greatly affected the formation of his theory on imperialism and capitalism. By comparing Hobson's works on the Boer War and *Imperialism*, we can acquir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Hobso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eralism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Key Words: Imperialism, John A. Hobson, Second Boer War, New Liberalism, Capitalism, Jingoism,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謝辭·····	1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目錄·····	v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4
第三節 研究取徑·····	10
第一章 第二次布爾戰爭的背景·····	12
第一節 布爾戰爭的前因後果·····	14
第二節 1870 年代以來的帝國主義發展脈絡·····	20
本章小結·····	24
第二章 布爾戰爭前的霍布森思想發展·····	25
第一節 霍布森早年的思想發展·····	25
第二節 從消費不足理論走向新自由主義之路·····	27
第三節 從新自由主義走向反帝國主義之路·····	29
本章小結·····	32

第三章 霍布森的反布爾戰爭論述.....	33
第一節 《在南非的戰爭》：反駁布爾戰爭的英國方正當性.....	33
第二節 《好戰主義心理學》：媒體結構與群眾心理.....	40
本章小結.....	46
第四章 在反布爾戰爭脈絡下形成的反帝國主義理論.....	47
第一節 帝國主義理論的形成.....	47
第二節 《帝國主義》中的布爾戰爭論述脈絡.....	54
本章小結.....	59
結論.....	60
參考文獻.....	63





一、研究動機

約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 1858-1940)是最早期針對帝國主義的現象與意識形態，提出一個系統化理論的經濟學與社會學者。他一生出版過的著作繁多，但最為人所知的，仍屬他在 1902 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一份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他在本書中將 1870 年代以來的歐洲列強日益積極的殖民、擴張與剝削行為，定義為帝國主義，大力批判其中的帝國主義者的不義與虛偽之處；並將資本主義的因素，與帝國主義發展的脈絡相連，成功地創立了一個整合經濟與政治層面的帝國主義理論架構。霍布森對帝國主義的論述影響深遠，包括日後提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名言的列寧，以及布哈林、西佛丁等二十世紀初期知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將帝國主義批判融入馬克思理論的框架，明顯地承繼自由主義者霍布森的《帝國主義》脈絡。¹

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理論自出版以來，對二十世紀的社會、經濟、歷史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帝國主義論述的學術史脈絡之中，霍布森往往被視為一位早期的代表性人物，甚至是開啟者。²不過他的理論並不完美，他在論證與批判上過於側重國際金融資本主義的因素，其誇大金融家在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發展的角色比重之程度，甚至被部分學者形容為陰謀論。³他的帝國主義理論，乃至他其他著作中針對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之交經濟與社會議題之觀察，均受到後世學

¹ 關於霍布森帝國主義理論與馬克思主義流派間的關聯，可參見以下文章的討論：Daniel H. Kruger, "Hobson, Lenin and Shumpeter on Imperialism",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6(1955), pp.252-259; D. K. Fieldhouse, "Imperialism: An Historiographical Revision",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14(2)(1961), pp.187-209; A. M. Eckstein, "Is There a 'Hobson-Lenin Thesis' o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olonial Expansion?",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4, No. 2 (May, 1991), pp. 297-318; Nathaniel Mehr, "Introduction", in John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republished in Nottingham, England: Spokeman, 2011), pp.15-39

² 霍布森帝國主義理論的開源評價可參考：Nathaniel Mehr, "Introduction", in John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Richard Koebner,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2(1)(1949), pp.1-29; John Cunningham Wood, "J. A. Hobs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42, No. 4, 1983, pp. 483-500.

³ Gregory Claes, *Imperial Sceptics*(New York,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42

者的強烈抨擊。⁴今日學界對帝國主義此一主題之探討範圍，已遠遠超越十九世紀工業國家對第三世界之掠奪與侵占，進到帝國在直接控制領土之外，包括透過國際組織、自由貿易條約、以及強勢文化等等領域，衍伸出的其他支配殖民地或弱小國家的方式。霍布森的帝國主義定義，卻仍限制在探討帝國對不屬於原本國族疆域的領土之直接宰制，以及金融資本主義如何造就一個「不正當」的帝國統治方式。霍布森的帝國主義批判，忽視那些在帝國治下得以實現自治的殖民地，或是並未遭受工業力量強大的帝國武力侵略，卻因為簽訂不對等的工商業條約，而被剝削資源與市場的弱小獨立國家，因為這些情況並不符合他的帝國主義定義。他的反帝國主義批判，以及對帝國主義理論之建構，在今日看來已是非常狹隘。

如今霍布森於《帝國主義》為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已經難以合乎學界的需求。但這並不表示，霍布森與他的反帝國主義著作，已經全然失去學術價值。霍布森對帝國主義的定義與討論，非常適合用以觀察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英國自由主義政治思想所遭遇的變化與挑戰。霍布森並非當代反帝國主義的第一人，事實上在英國社會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對 1870 年代後逐漸興起的新帝國主義政策傾向與意識形態，多半反感。1840 到 1850 年之間之以理查·柯布登 (Richard Cobden, 1804-1865) 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以及由名相格萊斯頓帶領的自由黨，皆主張小政府主義、減少干涉國際事務、減少擴張殖民地與軍備，並且在推行政策的原則上鼓勵以英國種族與文化為主的殖民地自治。這些自由主義理念，與意欲強化英國在國際上的角色，強化大英帝國的軍力與對外影響力，以殖民地之資源市場振英國本土之經濟的帝國主義思想，正好是完全衝突的。

古典自由主義的政治與經濟原則，在 1840 到 1870 年代的英國漸成主流，然而 1873 年到 1896 年英國開始遭遇工商業成長衰微、失業率攀升與物價低迷的經

⁴ John Gallagher 與 Ronald Robinson 在撼搖學界對帝國主義定義的文章“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中，批評過霍布森帝國主義理論忽視了英國帝國政策的延續性；Peter Cain 與 A. G. Hopkins 的著作 *British Imperialism, 1688-2000* 中，則批評霍布森未能注意到英國帝國主義中的農業因素；使史學家 Andrew Porter 的文章“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 Context and Motive Reconsidered”，則是重新檢視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理論影響下，史學界對布爾戰爭成因脈絡的解釋，並提出新的論點反駁霍布森過於著重資本主義因素的問題。

濟問題，這段時期的經濟危機被稱為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顯示英國工業革命後引以為傲的工業經濟發展出現了瓶頸。古典自由主義宣稱市場必達到完美供需平衡的經濟學說，難以解釋十九世紀晚期工業生產力強大的英國，何以遭遇數次經濟蕭條。因此，自由主義的學說開始受到當代政界、社會與學界的質疑和挑戰。帝國主義者便是主張擴充海外市場，以拯救英國工業生產過剩的問題。此外，過去古典自由主義甚少處理的社會與勞工問題，也在十九世紀晚期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面臨這些挑戰，十九世紀晚期的自由主義者，必須一面堅持自由主義的理念，一面重新省思政府與社會、大英帝國與世界的關係，調整古典自由主義的學說，以適應新的時代。

霍布森就是這個自由主義轉型期間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身於德比郡的自由派報人家庭之中，深受古典自由主義學說的浸淫；但在 1880 年代期間，受到墨梅里的影響，與之合作建立了探討市場需求不足之理論，對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教條提出挑戰。霍布森也非起初便抱持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他是在加入彩虹社(Rainbow Circle)之後，將金融資本主義(Financial Imperialism)引入他的經濟學理論中，才使他對待帝國主義的立場開始轉變。

1896 年初爆發的詹森行動，則成為他公然對英國殖民地的資本家與帝國主義行徑表達厭惡的轉捩點。這個事件也開啟了霍布森對其後日益白熱化的南非問題的關注，1899 年他更到即將爆發第二次布爾戰爭的南非，進行九個月的採訪與研究，回國後陸續於 1900 年出版《在南非的戰爭：原因與效應》(*The War in South Africa: Its Causes and Effects*, 1900)，於 1901 年出版《好戰主義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Jingoism*, 1901)。此兩作皆為探討布爾戰爭的前因後果，以及英國社會呈現的非理性好戰氛圍，批判大英帝國之外交、殖民政策不當而導致戰爭後果，並更進一步地指控，在大英帝國的帝國政策之後，扮演推手的便是在南非礦業有大量利益的資本家與在倫敦操控國際金融的金融業者。

上述兩部反戰著作出版之後，緊接的便是霍布森最為人知悉的著作，1902

年出版的《帝國主義》。1902 年正好也是布爾戰爭正式結束的一年，這場戰爭標誌了英國新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高峰階段。霍布森在戰爭爆發前到戰爭結束，皆堅定地抱持反戰立場，批判英國方面的政策失當，致力於為布爾人方面發聲，破除英國社會對布爾人的偏見。更重要的是，他將戰爭與英國群眾受到煽動的好戰情緒，皆歸諸於為了維護在南非利益的資本家與金融業者的影響與操控。這個論點延續到 1902 年的《帝國主義》之中，成為霍布森批判帝國主義最有力的論據之一。從《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許多論點的理路，與霍布森的前兩部反布爾戰爭著作非常類似。這兩者的經驗顯然在霍布森的思想發展之中，有很明確的傳承關係。霍布森由於採取反帝國主義立場，而站在反布爾戰爭的一方，這個經驗又對他日後的帝國主義理論有極大貢獻。釐清這兩者之間的脈絡交織與交互作用，或許可以協助我們更加清楚一個處於十九世紀末的自由主義者，如何尋找出一條反對聲勢日隆的帝國主義，又能修正傳統自由主義教條的道路。

本論文的主旨便在於探討霍布森的反布爾戰爭著作，與他後來的大作《帝國主義》之間的傳承脈絡，以此理解布爾戰爭的經驗，如何影響霍布森型塑帝國主義理論的過程。並且探討霍布森的反帝國主義與反戰爭論點，如何地繼承古典自由主義的脈絡，又如何地受到十九世紀晚期自由主義轉型的影響，引入新的社會主義與基進主義思想。或許我們能夠從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理論型塑過程，不只理解霍布森個人的思想史，更能藉之窺見十九世紀晚期英國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之衝突、發展、轉型的脈絡。

二、 研究回顧

1. 英國 1870 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的帝國主義發展

本段的背景敘述約以 1870 年代起，敘述至布爾戰爭結束。挑選 1870 年代作

為分界，與英國社會在這個時期面臨的經濟問題，以及帝國主義的傾向有關。

早期的大英帝國史研究者，詮釋帝國主義的概念較著重政治層面，對帝國的定義依循較傳統的疆域和直接控制的概念。最早開始研究帝國史的十九世紀晚期史家約翰·席利爵士(Sir John Seeley, 1834-1895)就視 1860 年代是一個自由貿易與殖民地自治政策得勝的時期；到二十世紀前期的伯德森(C. A. Bodelsen, 1894-1978)，更進一步地鞏固 1870 年代作為反帝國主義與新帝國主義分期的說法。這一分期觀認為：英國自美國獨立以來就開始反省殖民地政策與重商主義，1830 至 1860 年代左右，自由貿易主義成為主流，英國並鼓勵殖民地自治，乃反帝國主義(anti-imperialism)的高峰期；但 1870 年代到二十世紀初葉，英國遭遇經濟大蕭條與競爭對手興起，自由貿易政策受到質疑，反倒是帝國主義成了問題的解藥。於是 1870 到 1914 年間就被劃分為「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時期。

5

然而，這個傳統的分期法在 1953 年受到兩位史家的挑戰。約翰·加拉格(John Gallagher, 1919-1980)與羅納德·羅賓森(Ronald Robinson, 1920-1999)共同發表了一篇修正主義論文：〈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這篇論文不僅駁斥英國十九世紀帝國政策前後不同的看法，還提出「非典型帝國」(informal empire)的概念。所謂非典型帝國，就是指帝國的概念並不限於傳統的疆域擴張或政治上的建制，透過簽署自由貿易條約保障帝國在殖民地的經濟利益等方式，也是帝國政策的一環。加拉格與羅賓森因而論斷，英國歷史不但沒有反帝國主義時期，「新」帝國主義也不新。1870 年代以前的英國並沒有中斷帝國疆域的擴張，且以非典型帝國的概念來重新詮釋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即可發現英國帝國政策乃遵循同一方向。〈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引來許多爭論與批評，並開啟了二十世紀後期帝國史研究的一條新方向。史家開始檢視十九世紀前後的英

⁵ Paul Kennedy,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in British Imperialism, 1815-1914’; C. C. Eldridge, ‘Sinews of Empire: Changing Perspectives’, both in C. C. Eldridge(e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U.S.A.: St. Martin’s Press, 1984)

國帝國政策之連續性，並重新檢討過去史家對分期差異的誇大詮釋。⁶

然而 1870 年代的分期觀並非沒有根據。1870 年代起，英國開始遭遇經濟大蕭條，刺激當代人去思考英國工商業發展過程遭遇的問題。原本英國經濟學者、工商業者與自由主義政治人物，信奉自由貿易主義的原則，認為市場供需會自然達到平衡，如今卻遭遇生產過剩、物價凋敝的經濟蕭條。同時期，歐洲各國的海外競爭愈發激烈，英國在化學、鋼鐵等領域的工業，面臨新興工業帝國如美國、德國的挑戰，種種條件讓當代英國人難以擺脫帝國衰退、優勢不再的焦慮感。有些史家認為，非典型帝國的概念的確是重要的帝國史新視野，也同意十九世紀的英國帝國政策有一致脈絡，但他們也認為 1870 年代的分期顯示出帝國主義政策基於十九世紀後期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仍然有所轉變。轉變的原因、方向，以及時人的心理變化，仍是這個時期值得被研究的議題。⁷

2. 十九世紀後期的媒體與輿論問題

霍布森的其中一部反戰著作《好戰主義心理學》，其中很大篇幅地批判了當時的媒體與輿論的好戰主義現象，他認為在南非資本家控制所有新聞資訊的情況下，媒體環境並無自由與獨立可言。而輕信的英國大眾——無論是有接受過教育或目不識丁者——不願意理性地思辨這些資訊的偏頗與真偽，也基於愛國主義而不願意包容反戰輿論，甚至直接地以暴力、商業抵制的方式阻止另一種立場的言論傳播。

霍布森對當代媒體與大眾的批判並非獨創。根據馬克·漢普頓(Mark Hampton)探討十九世紀下半葉英國報紙業界的從業理念的著作《英國媒體面面觀》(*Visions*

⁶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Vol. VI, no. 1 (1953)

⁷ Paul Kennedy 就認為 Gallagher 與 Robinson 在擴大帝國定義於政治之外固然是完全正確的方向，但也不能忽略英國在 1870 年代以後因為國際競爭加劇，以及國內經濟蕭條帶來的不安感，採用政策的心態與以往不同的現象。詳見：Paul Kennedy,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in British Imperialism, 1815-1914', in C. C. Eldridge(e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f the Press in Britain, 1850-1950)所言，這些來自中產階級的改革者們，追求的「媒體自由」(media freedom)之內涵，是十七世紀以來形成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定義。自由主義者信奉個人主義與理性，他們認為個人具有獨立理性思考的能力，只要個人依循理性行事，社會就能良好運作，因此不需要以規範束縛個人自由。但在十九世紀的中上階級眼中，大眾並無足夠的知識與道德，能夠獨立理性思辨，遑論參與政治。因此在大眾必須先接受教育，才能得到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實踐民主政治的資格。

報紙是中產階級改革者推行教育的重要工具。因此對改革者而言，屏除非法、低俗的小報，給予大眾講述正確知識的讀物非常重要。改革者呼籲廢除印花稅等法令，其目的便是為讓大眾買得起便宜的「合法」報紙，使不受控制的非法小報失去競爭力。此一改革背後的理念，與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者看待其他人種的態度有相仿之處。中產階級與帝國主義者自命為道德與知識更優越者，有權統治並教育下層大眾與其他人種，「教化」(civilized)他們。十九世紀的中產階級認為窮人的處境肇因於無法自助(self-help)，自助則是中產階級道德概念中的一環。因此不道德(immorality)導致貧窮，貧窮也成為罪惡淵藪。在 1850 到 1880 年代流行於報業的教育理念(educational ideal)，其實根源於中產階級期望控制社會的想法。

1880 年代以後，開始有人使用「新新聞主義」(new journalism)一詞，描述當代新興的新聞寫作風格與報紙出版形式，這些形式與 1850 到 70 年代間傳統報業的理念大相逕庭。⁸這個時代的新新聞主義概念，最明顯的特質是非政治取向。1850 年代視教育大眾政治知識為報紙主要目的的思想，如今抵擋不住以商業利益為重的發展潮流，報紙必須迎合讀者的閱讀習慣與興趣，減少政治新聞的篇幅。進入 1880 年代以後，報紙的政治性新聞的版面減少，轉而著重其他類型的新聞，像是運動新聞，便在此時代蓬勃發展，連帶引起報導賭博資訊的風氣。此外，新

⁸ Alan J. Lee, *The Origins of the Popular Press in England, 1855-1914*(London, UK: Croom Helm, 1976), p.117

聞寫作的形式也有許多轉變，報導寫作方式較不嚴謹，風格亦較過去煽情、親近讀者。這些報導風格的轉變，使報紙更貼近大眾的日常生活，也有助報紙銷售量上升。然而，這樣的轉變風氣絕非抱持理想的編輯、文人所樂見，他們視之為不道德與反智的發展。新新聞主義對傳統報業而言，就是一切不好的新現象的集合代名詞。儘管到了二十世紀，仍有許多老派報業人士堅守報紙的教育功能，但整體而言，十九世紀晚期的教育理念已逐漸式微。⁹新新聞主義之所以誕生，報紙向商業利益靠攏絕非唯一的因素。與十九世紀中期的社會氛圍相比，1880年代有逐漸對理性溝通(*rational communication*)失去信心的趨勢。前段所述的教育理念能盛於一時，其信念根植於自由主義者對理性與社會進步樂觀的信仰，但十九世紀晚期的輿論卻逐漸對個人理性能力失去信心。當代有些觀察家認為，報紙不可能以理性說服(*rational persuasion*)的層次影響大眾。¹⁰霍布森亦是在這個脈絡下，寫作《好戰主義心理學》，發展對媒體背後的資本結構，以及報導媚俗偏頗化，致使不分階級的英國大眾朝向非理性愛國主義發展的社會批判理論。

3. 霍布森帝國主義理論的研究

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理論作為帝國主義批判者的先鋒，其地位是無庸置疑的，然而其理論中對帝國主義的定義與研究範疇卻過於狹隘。儘管霍布森就他的時代而言，確實是一位反帝國主義者，但他並非完全反對帝國；他打著反帝國主義旗號下的部分論述，是在正當化帝國統治殖民地的作為。另外，霍布森對於帝國主義與布爾戰爭的詮釋，都過於強調資本主義的因素，而忽略英帝國政治與戰略的考量。由於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理論與反布爾戰爭論述，對此二研究領域皆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因此學界自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對霍布森的理論提出了相當多的批評與反思。

⁹ Mark Hampton, *Visions of the Press in Britain, 1850-1950* (Illinois, U.S.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04), pp.48-71

¹⁰ Mark Hampton, *Visions of the Press in Britain, 1850-1950*, pp.94-101

研究霍布森思想的著作中最具系統性的，莫過於彼得·凱恩(Peter Cain)的《霍布森與帝國主義》(*Hobson and Imperialism*)，本書完整地呈現了他一生的所有著作與思想演變的過程。彼得·凱恩認為，霍布森思想最重要的主軸，是解決 1870 年代以後英國經濟蕭條的問題，而經濟蕭條的主要根源，則是來自英國市場供過於求的問題。霍布森一生都在試著完善與證明他學術生涯第一本著作《工業生理學》(*The Physiology of Industry*)所提出的需求不足(*underconsumption*)理論，這個動機促使他在 1890 年代加入社會主義社團，進而激發他對帝國主義現象興趣，並以其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思想脈絡結合後的學術基礎，方造就他的帝國主義批判理論。

而《霍布森與帝國主義》亦提及霍布森對待帝國主義態度的前後轉變，顯示他並非一位堅定的反帝國主義者。霍布森在《帝國主義》出版後遭受學界與輿論的抨擊，使他開始檢討自己在《帝國主義》之中，提倡限制英國發展國際貿易的觀點。到了 1911 年，霍布森對於帝國主義已改採較為正面的態度，他開始肯認英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對於促進殖民地文明化、工業化的貢獻與正當性。¹¹

格瑞格·克萊斯(Gregory Claeys)的《帝國的質疑者》(*Imperial Sceptics*)對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理論之中，具有家父長主義色彩、承認西方帝國以殖民推廣文明化之正當性的論述，有更進一步的批判。克萊斯認為霍布森儘管名義上採取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實際上卻非如此。他提出霍布森著作中對於十九世紀西方自由主義、議會民主與工業文明等成就的讚揚，論證了霍布森所反對的帝國主義，僅限於採取暴政、資本主義剝削與軍事行動的帝國政策；但霍布森卻贊成帝國採行溫和漸進的手段，來推廣上述的近代西方文明價值。除此之外，霍布森還在反帝國主義論述之中，大力提倡以國際主義來取代帝國主義，他認為應設立一個國際政府，解決國際間的各式紛爭，使尚武的帝國主義得以退場。克萊斯便以此項論點，論證出霍布森反帝國主義思想之中隱含的帝國主義心態，他認為霍布森實則為社會帝國主義者(*Socialist-imperialist*)，帶有反資本主義、關懷全球勞工階級、提倡

¹¹ Peter Cain, *Hobson and Imperialism*(New York, United 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大政府的社會主義立場，來推動家父長主義色彩濃厚的國際政府。最終來說，霍布森的立場仍然尊崇英帝國等近代西方文明的價值觀，並認為世界其他區域應當接受西方制度與文化，只是其手段與目的比起當代一般的帝國主義者更具有人道與社會主義的關懷而已。¹²

霍布森在布爾戰爭期間所提出的論述，後來也影響到布爾戰爭史研究者對戰爭成因的看法，特別是霍布森強調南非資本家與國際金融業者(以猶太裔為主)，在英帝國對布爾人發動戰爭的決策過程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使得史家長期以來傾向以資本主義與經濟帝國主義詮釋布爾戰爭的前因後果。帝國史學者安德魯·波特(Andrew Porter)對此提出了一篇文章〈南非戰爭(1899-1902)：文本與動機的再思考〉(“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 Context and Motive Reconsidered”)，反省史學界受霍布森影響所忽略的布爾戰爭政治因素面向。波特認為，資本主義影響英帝國對外政策傾向有限，霍布森的說法過於著重資本主義與金融家對政治的影響力，而霍布斯邦與著重物質與利益因素的史學家，則過於強調英國對南非黃金等礦產的重視程度。自南非問題開始成為英國政治的重要議題到布爾戰爭爆發，英國方面的決策並非以資本家的利益為考量方向，而是受英國傳統對歐戰略與國際關係政策的處理方式，以及當時的英國政黨與政治人物決策思維與方式所影響。英帝國在發起戰爭決策的過程，未必是著重於併吞布爾共和國後可得的實質資源與利益，而是為了維護英帝國在海外的權勢聲名，以及防止德、法等其他列強擴展非洲的勢力範圍，影響英國的戰略布局。¹³

三、研究取徑

本論文以約翰·霍布森的三本著作作為主要的史料分析對象，三本著作分別是《在南非的戰爭：原因與效應》、《好戰主義心理學》，以及《帝國主義：一份

¹² Gregory Claeys, *Imperial Sceptics*

¹³ Andrew Porter, “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 Context and Motive Reconsidered”, in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31, No. 1, 1990, pp. 43-57.

研究》。前兩部著作為霍布森的反布爾戰爭論述相關作品，《在南非的戰爭》一書，乃霍布森於布爾戰爭前夕至南非當地的採訪調查，探討帝國主義政策如何造成布爾戰爭，並歸結出資本主義在當地社會的剝削問題。《好戰主義心理學》則是談布爾戰爭期間的英國社會與媒體，探討媒體背後的資本結構，以及當代英國社會對戰爭表現出的非理性情緒與反民主問題。第三部著作《帝國主義》則是霍布森定義帝國主義，並從經濟與政治兩層面探討帝國主義在 1870 年代後在歐洲興盛的根源，最後批判帝國主義對人類文明、國際和平與國家民主造成的災難的理論著作。本論文寫作之目的，便是要說明霍布森在《帝國主義》之中，延續諸多《在南非的戰爭》與《好戰主義心理學》兩部反布爾戰爭著作的研究方法、材料與思考脈絡，以此說明布爾戰爭經驗，在其形塑帝國主義理論過程中的影響。

本文的寫作方式，將先於第一章略談英國發動布爾戰爭的背景脈絡，及十九世紀後期的新帝國主義現象，以便讀者對於霍布森之理論與布爾戰爭有一概略性的背景了解。第二章則介紹霍布森在發展帝國主義理論以前的早年學術發展，包括他對市場供需提出的修正理論，以及從支持帝國擴張到批判帝國主義立場的發展過程。第三章則對《在南非的戰爭》與《好戰主義心理學》兩書作文本分析，解讀霍布森在兩書中如何論證英帝國與資本家的戰爭責任，以及當代社會、媒體與資本主義間的結構關係，從霍布森對布爾戰爭的批判，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於當代英國與歐洲社會、對於一個理想的政治與文明社會的看法為何，這之中則蘊含了何種思想脈絡。第四章則是分析《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的定義與理論，以及《帝國主義》從前兩部反戰著作中承繼到的思想脈絡。

第一章 第二次布爾戰爭的背景



1899 年至 1902 年間，英國在南非與川斯瓦共和國(South African Republic，或稱 Transvaal Republic)以及橘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作戰，史稱第二次布爾戰爭(Second Boer War, 1899-1902)。英國以龐大的代價換得這場戰役的勝利，推翻兩個布爾人政權，將南非地區完全納入英帝國的治下。¹

就英國近代史而言，布爾戰爭絕不僅是一場普通的殖民地戰爭。²布爾戰爭的規模遠超過英國任何一場殖民地戰爭，花費甚至超過克里米亞戰爭；戰爭的正當性與必需性亦引發當代政治、社會、學術各界對英帝國的前所未有的關注與爭論。霍布森最精華的反帝國主義著作《帝國主義：一份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 1902)，也是深受布爾戰爭的經驗影響而成。霍布森認為布爾戰爭乃因興盛於當代英國的帝國主義，以及資本家的利益而起。受其論述脈絡影響，二十世紀以來的史家傾向於將布爾戰爭視為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發展脈絡中的一環，而非一個獨立的政治事件。不過近年來學界提出許多批判，此觀點被認為過於簡化資本家利益與英帝國擴張的關係，詮釋英國發動布爾戰爭的動機也過於片面，英帝國擴張的動機未必完全為了符合資本家的利益，英國政治外交政策的脈絡也應被考量。事實上布爾戰爭前蘭德金礦的英方投資並未受阻，難以證明英國乃單為資本家利益與帝國主義意識型態，而必須引發布爾戰爭以解決南非問題。

然而，儘管霍布森式的觀點在今人眼中有相當多的問題，我們仍須認知到：

¹ 進一步了解布爾戰爭細節，與相關的研究可參考：Greg Cuthbertson, Albert Grundling, and Mary-Lynn Suttie(eds.), , *Writing a Wider War: Rethinking Gender, Race, and Identity in the South African War* (Ohio, United State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ula M. Krebs, *Gender, Race and the Writing of Empire: Public discourse and the Boer War*(Cambridge, United Kingdo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² 第二次布爾戰爭耗費了兩億一千七百萬英鎊，遠超過英國在過去所有殖民地戰爭的費用，甚至遠高過克里米亞戰爭。死傷方面，英軍動員了五十萬人左右，並折損兩萬兩千人。此外，英國還招來國際輿論的撻伐，美國與歐洲列強基於瓜分非洲利益問題，對於英國的擴張行徑不滿，而且也同情意欲維護自身獨立的布爾人。在英國國內，輿論也非一面倒地支持戰爭。被稱為「親布爾派」(the pro-Boer)的反戰人士，基於人道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精神，批評這場戰爭既非正當(just)，也非必要(necessary)；而即使是戰爭的支持者，也無法坐視英國在戰爭後期採用的集中營政策，並批判政策造成布爾婦孺的嚴重傷亡。

霍布森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論述，是為了解決當時英國的政治與經濟問題，並批判當代社會的思想氛圍。布爾戰爭發生時，英國正處於所謂「新帝國主義時期」(New Imperialism Era)，這段時期的英國逐漸改變十九世紀 1830-1870 年代左右的自由貿易政策，轉而走向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以保護本國貿易，並更積極擴張殖民地鞏固海外市場。³這段時期提倡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學者與社會人士亦不斷增加，帝國主義在當代既是一個正面的意識形態，對許多人而言也是解決英國經濟問題，使世界進化的必經過程。布爾戰爭爆發，將帝國主義相關論戰帶向一波高峰，政壇、學界、輿論激烈地爭辯布爾戰爭是否正當、是否必須，其中合理化布爾戰爭正當性與必須性的一條脈絡，便是帝國主義意識型態。而霍布森在 1890 年代以後逐漸成為一個反帝國主義者，他在布爾戰爭時期的各種反戰論述，便是為了反駁當代的帝國主義思潮，證明英國採行帝國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對改善英國政經問題毫無幫助。他在布爾戰爭前期在南非擔任記者，期間他對南非的政商媒體合作現象的觀察，也在《帝國主義》等著作中化為他批判帝國主義的論證基礎。是故我們若要正確的理解霍布森的反帝國主義思想，不能不探討布爾戰爭的時代氛圍對他的影響。我們必須理解當時的人如何看待布爾戰爭，時人支持或反對戰爭所持的理由與思想脈絡，方能更貼近霍布森所欲探討的議題。

本章將敘述布爾戰爭的背景，並介紹當代支持戰爭與反對戰爭的論述，結合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英國政經社會情勢演變，分析不同立場論述的思想脈絡。第一節簡述布爾戰爭發生的前因後果，追溯英國與布爾人在南非地區的勢力衝突歷史，探討英國在南非地區戰略的變化，如何走向戰爭之路。第二節則談英國支持戰爭者的論述，呈現當代的帝國主義思潮與英國面臨的國際形勢。第三節則呈現

³ 「新帝國主義時期」是一個較為傳統的英國帝國史斷代名詞，背後史觀預設了英國在此之前曾歷經一段未採帝國主義政策與思想的「反帝國主義時期」(anti-imperialism era)，其定義多半將帝國主義侷限在領土與正式統治。1953 年 Robinson 與 Gallagher 共同發表的一篇文章〈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提出帝國主義的定義不應侷限於領土與統治，更應擴及到以自由貿易為手段擴張帝國勢力的部分。由此觀之，英國並無新或反帝國主義時期之分，其十九世紀的帝國政策一直是連貫的。詳見：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Vol. VI, no. 1 (1953); Paul Kennedy,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in British Imperialism, 1815-1914', in C. C. Eldridge(e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 U.S.A.: St. Martin's Press, 1984)

霍布森以外的反戰論述，檢視當代的反戰論述繼承的脈絡，與反戰論述之不能實現的原因。



第一節 布爾戰爭的前因後果

英國與布爾人在南非的衝突可追溯自 1795 年，也就是英國人取得南非的開普殖民地(the Cape Colony)的那一年。布爾人乃荷蘭殖民者的後代，在十七世紀中葉來到開普，自此與歐洲家鄉隔絕，在南非環境中自成新的文化。⁴一百多年後，英國人首次與布爾人接觸，便大感雙方的文化差異，並帶著優越性批判布爾人的文化。⁵而布爾人也不喜英國統治，特別是在英國於 1807 年廢除奴隸制度以後，法律上禁止奴隸買賣，並逐步地給予各殖民地奴隸法律上的自由身分，這衝擊到依賴奴隸為農牧產業勞力的布爾人。⁶於是，為躲避英國在開普殖民地的統治，1830 到 1840 年間，有些布爾人開始向南非地區的東北部內陸遷徙，此一現象被稱為大遷徙(the Great Trek)。布爾人在周遭有祖魯人(Zulu)、科薩人(Xhosa)等當地族群環繞之下，陸續建立了納塔爾共和國(Natal Republic)、川斯瓦共和國(Transvaal Republic)與橘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等政權。

然而，布爾人遠離開普自立政權，並未解決他們與英國之間的衝突問題，反而更激起英國在開普當局的緊張。原因乃是布爾人向東北移居，侵入了當地族群的生存空間，並為了彌補不足勞動力，採用過去荷蘭時期的方法——搶奪當地族

⁴ 布爾人(Boers)與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經常被混用來指稱同一族群，即使用阿非利卡語(Afrikaans)南非荷裔白人。兩個詞彙都限定南非荷裔白人使用，且可互通，但在布爾戰爭的時代兩個詞彙有使用上的差別。布爾人如同“Boer”一詞原義，被用以指住在農場上的人，也就是川斯瓦及橘自由邦那一帶的荷裔白人；阿非利卡人則是住在城市如開普敦，受到較好教育的荷裔白人。因此在使用上述兩詞，必須注意內涵中的經濟地位與文化差異。更詳細的相關討論請見：John J. Stephens, *Fuelling the Empire*; Helen Bradford, ‘Gentlemen and Boers’, in Greg Cuthbertson, Albert Grundlingh and Mary-Lynn Suttie(eds.), *Writing a Wider War: Rethinking Gender, Race, and Identity in the South African War*

⁵ Michael Streak, *Victoria's Stepchildre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South African Problem, 1795-1899*(U.S.A.: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 pp.1-17

⁶ 詳見：Leonard Thompson,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New Haven, Connecticut, U.S.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2-58

群的兒童作為奴隸——導致與當地各族發生嚴重的衝突。英國當局視開普殖民地為通往亞洲的重要海洋戰略地點，故希望維持殖民地邊界的穩定，而納塔爾地區的族群衝突可能對鄰近的開普造成威脅；且若布爾人在靠海的納塔爾建立一個穩定的政權，將成為英國未來在南非地區發展的阻礙。故在 1842 年，英國即出兵攻佔了納塔爾共和國，並持續佔領納塔爾附近科薩人的領土。不過在南非北部高原地區(Highveld)的橘自由邦與川斯瓦一帶，直到 1866 年橘自由邦發現鑽石礦以前，由於該地缺乏資源和海運，當地布爾政權十分窮困無威脅性，英國便沒有動力立即將兩地納入己治之下。⁷

1860 到 1870 年代之間，有各種傳聞顯示高原地區有豐富的金礦和鑽石礦藏，激起英國殖民者與投資者對南非內陸的興趣，對於一直以來只能依靠農牧業的布爾人來說，貴金屬礦是拯救其財政的及時雨。然而在這段時期發現的金礦皆為很快耗盡的小型礦脈，開發價值低落，對外資吸引力不足，川斯瓦政府於是在 1877 年面臨到嚴重的財政困境，並遭英國吞併。⁸隨後在 1879 年，英國與祖魯王國間爆發祖魯戰爭，這場戰役瓦解了祖魯王國，也是川斯瓦人長期以來的心腹大患。祖魯王國的威脅消失以後，於 1880 年，不滿英國統治的川斯瓦人在保羅·克魯格(Paul Kruger, 1825-1904)的帶領之下，起身反抗英國，尋求川斯瓦再次獨立，此乃第一次布爾戰爭(the First Boer War, 1880-1881)。結果克魯格率領的布爾突擊隊(Commando)以優異的戰術和組織能力戰勝了英軍，贏得英國方面承認其自治權，並在 1884 年的倫敦和約(the Convention of London)中，川斯瓦共和國得以完全獨立。

重獲獨立的川斯瓦共和國仍然是個窮困且建設落後的國家，國內產業仍以農牧業為主，缺乏鐵路建設，也無海港，對外交通極不方便。然而這樣的局面並不持久，很快地在 1886 年，世界最富金礦——維特瓦特蘭德金礦，通常簡稱蘭德金礦——在川斯瓦南部邊境被發現。它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卻也衝擊了川斯瓦人原

⁷ Leonard Thompson,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pp.87-96

⁸ Leonard Thompson,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John J. Stephens, *Fuelling the Empire* (Chichester, England: Wiley, 2003)

本封閉、自給的生活。由於川斯瓦共和國缺乏開發蘭德金礦的人力、技術、機械以及資金，她不得不倚賴外國投資與外來移民，而這兩者最主要的供應來源皆為英國。隨著英國的投資者與移工湧入約翰尼斯堡，川斯瓦的布爾人對英國勢力入侵的警覺心也再度上升。這些外來移民被布爾人稱為外僑(Uitlanders)，他們在川斯瓦共和國並不具備與布爾人對等的政治權利，這點之後成為英國企圖干預川斯瓦政治的藉口。

1896 年的新年，川斯瓦軍隊在邊界地區阻止了詹森行動(the Jameson Raid)。此行動乃由英屬南非公司的掌管者賽西爾·羅德斯(Cecil Rhodes, 1853-1902)與親信詹森醫生(Dr. Leander Starr Jameson, 1853-1917)策畫並執行，意圖由詹森醫生引領一小群軍隊，聯合約翰尼斯堡的英國外僑起事，推翻川斯瓦總統保羅·克魯格。⁹然而此一行動由於情報洩漏等問題，川斯瓦軍隊在詹森一群人進入邊界以前就將其一網打盡。這個行動的失敗與曝光，嚴重地影響了英國與川斯瓦共和國的關係，使日益緊張的局勢雪上加霜，英國不尊重川斯瓦主權的行動也遭受國際嚴厲的抨擊。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 German Emperor, 1859-1941)更致電予克魯格，恭賀川斯瓦部隊的英勇表現，然而此一電報卻遭英國報紙揭露，激起英國社會一片反德聲浪。而詹森醫生回英國受審時，則被許多英國人視為英雄。詹森行動儘管是一起失敗的小型軍事行動，卻引起極大的後續效應；它並非第二次布爾戰爭爆發的原因，卻使布爾人重新認識到英國對南非領土的野心，英國也必須面對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調整政治外交政策。雙方原來的緊張關係，便升級到戰爭一觸即發的敵對狀態。¹⁰

除了羅德斯之外，當時的英國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 1836-1914)，以及於 1897 年在張伯倫指派下擔任南非帝國公使(High Commissioner)的阿弗烈德·米爾納爵士(Sir Alfred Milner, 1st Viscount Milner,

⁹ 賽西爾·羅德斯是十九世紀後期南非最富盛名的英國資本家、政治家及帝國主義者。羅德斯懷抱的願景乃是由大英帝國統治整個南非地區，在此願景之中，以布爾人為主的政權則是必須除去的阻礙。

¹⁰ 關於詹森行動的詳細前因後果與影響可見：G. Blainey, 'Lost Causes of the Jameson Raid',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8, No. 2 (1965), pp. 350-366

1854-1925)，是對南非採取強硬帝國主義政策的代表人物。他們心中的理想世界秩序，乃是大型帝國統治整個世界，並推廣帝國統治民族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到被統治的各區域。英帝國由於具備自由傳統與良好代議體制，是所有西方帝國中最適合統治世界者，然南非地區因為川斯瓦與橘自由邦等小國，成了英帝國最脆弱的一環，是她推行英式政制與文化的障礙。自從詹森行動將南非變成 1896 到 1899 年英國政壇矚目的焦點，張伯倫就積極地以英裔外僑問題為由，採取強硬的政策意圖干預川斯瓦政權。他依據倫敦和約中的條文要求川斯瓦政府必須按照英國的意願修改外僑相關法令，並在 1897 年將屢次質疑張伯倫作法將引發戰爭的南非帝國公使赫丘勒斯·羅賓森(Sir Hercules Robinson, 1st Baron Rosmead, 1824-1897)撤換，改任信奉英國帝國主義、對布爾人態度更強硬的米爾納。¹¹

米爾納就任後無意於緩和局勢或向布爾人尋求妥協，他深信英國種族的優越性以及英帝國統治為殖民地和落後國家帶來的好處，他並不主張英帝國必須持續擴張，但必須鞏固帝國既有的疆域。¹²儘管米爾納有意引導英國更強勢地解決南非問題，他與張伯倫仍認識到戰爭並不受英國政壇與社會的歡迎，若局勢演變到雙方開戰，沒有做好戰爭準備的英國亦將付出龐大代價。因此，米爾納的戰略是將局面導向令川斯瓦方面主動尋釁，如此英國就擁有正當的開戰理由，戰爭亦能得到國內一致支持。於是米爾納就任後便開始在英國與南非兩地積極佈署輿論，他在南非媒體中安排自己的人馬以煽動輿情，他並策動蘭德地區外僑的連署，以此要求英國當局介入川斯瓦外僑問題。¹³

另一方面，川斯瓦當局也積極備戰，克魯格總統向歐洲購買大量新型武器，加強自己在川斯瓦政府中的控制力，並且與橘自由邦同盟，一同對抗英國在南非

¹¹ 關於張伯倫援引倫敦和約干預川斯瓦的外僑政策：Iain R. Smith, *The Origins of 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New York, United States: Longman, 1996), pp.132-140；關於羅賓森與張伯倫對南非局勢的爭端可參考：Iain R. Smith, *The Origins of 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 pp.111-118

¹² Iain R. Smith, *The Origins of 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New York, United States: Longman, 1996), pp.145-148

¹³ Leonard Thompson,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Iain R. Smith, *The Origins of 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 pp.151-152

的擴張。這些動作也激起英國方面的緊張。儘管英布雙方仍在 1899 年 5 月與布隆方丹(Bloemfontein，橘自由邦首都)試圖透過協商緩和危機，協商的結果卻是失敗，雙方未能達成共識或讓步。張伯倫在 1899 年的 9 月向克魯格發送最後通牒，要求川斯瓦方面給予外僑完整公民權；但克魯格的回應是一份要求英國在四十八小時以內將軍隊撤離川斯瓦邊界的最後通牒，英國方面並未照做。

1899 年 10 月 11 日，布爾方的軍隊率先向英國殖民地展開攻擊，揭開了戰爭的序幕。戰爭初期，英軍節節敗退，失去許多邊界據點。但在馬菲欽圍城(Siege of Mafeking)一役，巴登—鮑威爾將軍(General Robert Baden-Powell, 1st Baron Baden-Powell, 1857-1941)率軍苦撐兩百一十七天後，成功守住馬菲欽城(Mafeking)，使英軍士氣大振。事實上，馬菲欽僅為一個小城，原本英軍並不算防守此城。而且布爾軍一方為了避免損失，圍城攻勢也不猛烈。然而，英國媒體卻對馬菲欽圍城以戲劇化、英雄化的方式報導，引導讀者關心圍城狀況，累積緊繃的情緒。直到 1900 年 5 月 17 日傳來解圍消息，使民眾連日來的情緒爆發，全國各地家家戶戶為之慶賀，甚至有群眾上街狂歡、暴動、破壞。這個事件被稱為馬菲欽之夜(the Mafeking Night)。在部分當代觀察家眼中，馬菲欽之夜中的非理性與暴力的成分，違反傳統英國以理性、務實自居的民族性。霍布森亦以馬菲欽之夜為對象，剖析英國社會大眾如何受媒體渲染愛國主義與帝國主義觀念的影響，無法分辨報上偏頗英方的資訊，被激發出非理性的狂熱。¹⁴

接著戰爭進入所謂的第二階段，英軍開始展現反敗為勝的跡象。英軍逐漸收復被布爾軍攻佔的城鎮，並佔領了川斯瓦與橘自由邦的重要城市，掌握了整個南非的鐵路系統，逼使川斯瓦總統克魯格流亡歐洲。但此時英軍尚未完全掌控局面，因為習於游擊戰術的布爾軍轉而以游擊作戰，情勢對英軍依然棘手。

為了因應布爾游擊隊，英軍將領基欽納(Herbert Kitchener, 1st Earl Kitchener, 1850-1916)採用焦土政策破壞布爾人的農場，並將布爾、黑人婦孺等非作戰人員

¹⁴ John A. Hobson, *Psychology of Jingoism*(London, England; G. Richards, 1901); Kenneth O. Morgan, "The Boer War and the Media(1899-1902)", in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Vol. 13, No.1, 2002, pp. 1-16.

關進集中營，以這些策略斷絕游擊隊後援與士氣。然而由於集中營管理失當，導致數萬布爾與黑人婦孺死於集中營。南非集中營的慘況被英國婦女艾蜜莉·霍布豪斯(Emily Hobhouse, 1860-1926)寫成報導，在英國出版後激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即使是支持布爾戰爭的一方，也有許多人批評集中營政策不人道。儘管如此，英軍仍然透過這些政策逼迫布爾游擊隊在 1902 年 5 月完全投降，布爾戰爭到此畫上終點。儘管這場戰爭被視為白人間的戰爭，英軍實際上動用了許多黑人從軍，也設立了黑人的集中營，並導致一萬多人死於營內。¹⁵

戰後，在米爾納主持下，原川斯瓦與橘自由邦領土完全被大英帝國吞併。米爾納刻意地壓制布爾人的國族認同，他的理想是在南非徹底推廣英國式的體制與文化，由英裔族群引領南非白人，統治此地。然而，米爾納對南非族群的看法不夠實際，他的產業政策缺乏對現實環境的理解，英國化南非的目標也因此受阻。¹⁶另外，由於在南非無論布爾人和英裔社群，相對於非裔居民都是少數。急進地推動非裔參政權的改革，將導致白人無法維持在南非的優勢政經地位。同時，布爾人仍未失去自身的國族認同，改採溫和、有建設性的方式爭取自治的機會。米爾納於 1905 年離任，新上任的自由黨政府則很快地認識到：基於南非社會獨特的情況，英裔社群仍須與布爾人合作，以維持白人的政治優勢。¹⁷1909 年，英國國會通過南非法案，於翌年整合南非各殖民地，建立南非聯邦(Union of South Africa)。許多英國帝國主義者與布爾人皆以各自的國族為主，規劃過統一南非的藍圖，但必須與對方合作的結果，卻超乎他們的預期之外。現實中白人為少數族群的壓力，終究讓兩個曾經衝突不斷的白人族群選擇妥協，以便將多數的非裔原住民族群排除在政治之外。¹⁸

¹⁵ Peter Warwick (ed.), *The South African War: The Anglo-Boer War 1899-1902*, pp.204-205

¹⁶ Milner 的南非重建政策遭遇的問題，以及他未能成功的南非英國化目標相關討論，可以參考：S.E. Katzenellenbogen, "Reconstruction in the Transvaal", in Peter Warwick (ed.), *The South African War: The Anglo-Boer War 1899-1902*, pp.341-361

¹⁷ Peter Warwick (ed.), *The South African War: The Anglo-Boer War 1899-1902*, pp. 334-340; Leonard Thompson,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p.146

¹⁸ Leonard Thompson,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pp.146-147

第二節 1870 年代以來的帝國主義發展脈絡



在本論文分析或布森的布爾戰爭反戰論述以前，應當先釐清反戰論述所欲回應的對立面，即布爾戰爭的支持者——包括積極推動戰爭者、以及雖未直接參與戰爭但表態支持者——所持戰爭正當性與必需性論述的時空背景與脈絡。如同本章前述，霍布森等反戰人士的論敵，主要是帝國主義者。這些帝國主義者可能是保守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但共通的理念使他們一齊站到支持戰爭一方：他們相信世界應由帝國統治，而英帝國是最好的統治者，布爾戰爭則是鞏固英帝國的必要之舉。因此本節將簡述 1870 年代以來的英國帝國主義發展脈絡，

帝國主義是個相對新穎的概念，1858 年首次為人使用，在 1870 年間逐漸流行，到了 1890 年代則已是一個熱門的爭論議題。¹⁹起初帝國主義的概念有負面的意涵，它被用來指稱英國保守黨首相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的較為傾向干預外國事務、擴張英帝國影響力的對外政策。²⁰但自 1870 年代後，政界、學界開始有更多人提倡帝國主義。十九世紀晚期英國的帝國主義者的理念，大致有兩種論點：一是在十九世紀晚期英國與歐美其他國家貿易競爭愈發激烈的時代，為鞏固英帝國在海外各殖民地與勢力範圍的政治、經濟利益，應聯合英帝國統治下的各個區域，整合成一個近於聯邦的帝國，保護英國本土與各殖民地間的貿易，免得英國工業產品失去國際競爭力。第二種論點是則合理化英帝國統治的事實，英國的政治體制、文化為世界最佳典範，英帝國應肩負責任，將英式制度與文化推廣到世界各地，尤其是那些較為落後、不文明的區域。

前者隨著十九世紀步入尾聲，聲勢在英國愈加水漲船高。1873 年到 1896 年，英國的經濟陷入衰退，工商業成長不如以往，國內農業更是嚴重萎縮，這段時間也出現不少勞工失業、工廠倒閉等問題，且物價和薪資皆無法成長。這個階段所發生的經濟問題，被後來的史家稱為「經濟大蕭條」。經濟大蕭條對英國人的心

¹⁹ Richard Koeber,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2, No. 1(1949), pp.1-29

²⁰ Ibid., p.2

理影響深遠，由於英國國內工業發展在 1870 年代後陷入停滯，對照美國、德國等新興工業國家在化學工業等領域的突出表現，造成英國人對自身工業力量的國際領導地位產生嚴重的焦慮感。許多英國工商業者對於柯布登式(Cobdenite)自由貿易政策失去信任感，轉而期望政府保護英國對外貿易，確保英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並以政治、軍事力量擴張殖民地，確保海外市場，以解決國內的生產、資本過剩、消費不足等問題。²¹許多英國政界、社會、學界人士開始提倡帝國主義思想，強調英國必須採取帝國主義取向政策，以解決英國當前各種經濟、國際戰略問題。後者論述則受到神意論(providentialism)、種族主義(racism)與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影響，視白種人——尤其是英國人——為主體的帝國為比其他種族統治世界的更好人選，這個論點在 1890 年代更是臻於極致。1899 年詩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的詩作〈白種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就是帝國主義代表之作。

1890 年代的帝國主義已是一個影響力不容忽視的思潮，使英國社會更為傾向以政治或軍事手段解決這段時期日益白熱化的南非問題。賽西爾·羅德斯、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與阿爾弗雷德·米爾納爵士等人，便是當代著名的帝國主義政策主張者，他們在 1896 年詹森行動之後到 1902 布爾戰爭結束時，對南非問題擺出強硬且毫不讓步的姿態，被視為英國發動第二次布爾戰爭的推手。自由黨一方也出現自由派帝國主義者，如羅斯伯里勳爵(Archibald Primrose, 5th Earl of Rosebery, 1847-1929)，意圖引領原本力反帝國主義、承襲格萊斯頓理念的自由黨，迎合當代的帝國主義潮流，推廣兼具自由主義色彩的帝國擴張政策。費邊社乃主張以溫和改革方式推廣社會主義的社團，其代表性人物如韋伯夫婦(Sidney Webb, 1st Baron Passfield, 1859-1947; Beatrice Webb, 1858-1943)、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等人，在布爾戰爭前後，亦發表提倡帝國主義的言論。他們合理化帝國主義之論述，乃是認為川斯瓦共和國等小國，由於國家效能(national

²¹ L. C. B. 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1837-1901*(London, Great Britain: Routledge, 1973), pp.262-279

efficiency)低落，無法制衡資本家，不利於推廣勞工與社會福利政策；故應由英帝國等具有良好民主體制的帝國，將世界均納入其體制之下，方得保護全世界勞工階級的利益。這些帝國主義者本身的意識形態各異，從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皆有，卻都一致地將帝國主義視為推廣其理念的康莊大道。這也可以顯見當代英國社會，將「文明」的帝國宰制他者，視為理所當然的思想氛圍。

雖然 1870 年代在帝國史領域建立以來，就被視為帝國主義興起的重要轉捩點，但這個分期法的可靠性備受質疑。1953 年，羅納德·羅賓森與約翰·加拉格共同發表了〈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這篇文章顛覆了傳統史學界對帝國主義的分期與定義，將 1870 年代以前的英國海外歷史皆納入帝國史的探討範圍之中。1830 到 1870 年間，乃自由主義主導英國對外政策的時代，曾被視為「反帝國主義」的時代，以與 1870 年代以後帝國主義興盛的時期相對照。然而由於羅賓森與加拉格將自由貿易政策與經濟影響力納入帝國主義定義之中，並提出這段時期間英帝國並未因自由主義思想而停止海外擴張的證據，證明了英帝國在整個十九世紀以來的政策連續性，因而使 1870 年代作為帝國主義初興分期的說法失去說服力。

儘管我們已知帝國主義的行為與意識形態，絕非在 1870 年代後才興起，但 1870 年代仍有其作為分野的意義之處。不僅帝國主義一詞在 1870 年代以後才開始為人使用，1870 年代前後的英國的政治與社會氛圍也有相當明顯的差異。儘管英國十九世紀以來的海外擴張政策確實並未中斷再起，但制定與執行對外政策的動機、傾向與民間支持度卻也絕非前後一致。以 1870 年代以前的政治氛圍而言，自由貿易主義為基礎的政策方向仍比較受到歡迎，尤其在格萊斯頓領導的自由黨政府底下，其不願干涉國際事務與擴張海外勢力的傾向更為明顯。但 1873 年以降的經濟大蕭條卻帶給英國工商業界相當大的衝擊，這使英國政壇與社會開始意識到，1850 年代的自由主義的殖民與經濟政策，已經不適用於 1870 年代以後的世界，特別是為了要與新興工業國美國、德國等國競爭，繼續保持自由貿易

主義的英國將會失去競爭力。在整個政治與社會氛圍轉變的情況下，格萊斯頓的自由黨政府由於愛爾蘭政策不受歡迎，為挽救支持率而不得不在埃及問題上退讓，轉而支持佔領埃及。1883 至 1885 年間，英國與法國在西非競爭衝突轉烈，為了不在國際戰略上輸給傳統敵人法國，使得英國在非洲殖民地的戰略布局，朝著更積極佔領與更加強控制的方向前進。到了 1890 年代，帝國主義已經是英國政壇流行的用詞，並且同時受到保守黨與自由黨兩方的歡迎。傳統上反對帝國主義的自由黨，在此時分裂為支持帝國主義的自由帝國主義者與反帝國主義的傳統派，導致 1890 年代的自由黨在帝國政策方向缺乏一致性與明確性，1895 與 1900 的兩次大選皆敗於保守黨與自由聯合黨的聯盟。就在這個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高漲的氛圍之中，1896 年的詹森行動將南非問題端上了英國政壇的角力場，保守黨與自由聯合黨聯合政府、英國社會與學界的帝國主義與愛國主義傾向，將原本可以用溫和外交策略化解的危機，用強硬毫不妥協的帝國姿態將南非問題引爆成第二次布爾戰爭。

就 1870 年代前後的英國政策變化與政黨角力而言，1870 年代仍有其作為分水嶺的意義。帝國主義確實並非在此時才誕生，英國自十六世紀開始，向外發展殖民地、剝削資源與原住民族群的帝國主義行為就從未停歇；但卻是在 1870 年代以後，英國政壇與社會才逐漸開始面對自己的國家經濟發展，建立在英帝國擴張殖民地的事實上。這個年代的人們還不僅於認知帝國主義，1880 年代、1890 年代直至第二次布爾戰爭結束，英國是朝著更鼓勵、提倡帝國主義政策的方向前進，帝國擴張與強加於其他族群的文明教化，被視為理所當然且具有正當性的作為。儘管十九世紀的英國帝國主義連續性從未斷絕，但以認知和意識型態的發展脈絡來說，1870 年代仍然標誌了一個相當大的轉捩點。²²

²² 關於新帝國主義時期分野與學術脈絡的相關討論可參考：Paul Kennedy,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in British Imperialism, 1815-1914', in C. C. Eldridge(e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ames Stugis, 'Britain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in C. C. Eldridge(e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 C. Eldridge, 'Sinews of Empire: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C. C. Eldridge(e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本章小結



在大英帝國史與南非史家的詮釋中，第二次布爾戰爭標誌了英國新帝國主義的高峰時期。英國在南非與布爾人之間的衝突，早在進入所謂新帝國主義時期之前，就已有其深遠的脈絡。由於南非的開普與納塔爾等沿海地區，對英帝國的海外戰略十分重要，即使英國尚未進入新帝國主義時期，也一直積極控制這些戰略要津；1866 年與 1886 年南非分別發現鑽石與黃金礦，這些貴金屬資源更加刺激了英國掌握南非全土的野心。在帝國主義思潮興盛的 1870 至 1900 年間，英國為了提振經濟，迎合資本家與工商業者的思維而積極擴張海外市場，此外也為維護自身在新興工業國紛紛崛起，與眾帝國列強激烈競爭的戰略地位，而對亞、非洲等殖民地或勢力範圍採取更積極的干預政策，甚至不惜戰爭。布爾戰爭乃在上述背景之下展開，而無論是英國剛獲得開普殖民地的 1795 到 1830 年代、自由主義政策當道的 1830 到 1870 年代、還是 1870 年代以後的新帝國主義時期，英國對南非的帝國主義擴張行為，實際上從未停止過。布爾戰爭的成因脈絡，與英國十九世紀的帝國發展史，是完全脫離不了關係的。無論從經濟、資源、資本主義或國際戰略、外交政策的角度來談，英國帝國主義皆應為布爾戰爭的成因負起責任。

第二章 布爾戰爭前的霍布森思想發展



本章要談論的主題是霍布森其人早年至布爾戰爭前夕的思想脈絡發展，從霍布森初次踏入經濟學領域時，仍謹守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觀點的生澀；到霍布森接納了彩虹社的社會主義與改良自由主義的觀點，將失業與經濟蕭條現象視為資本主義經濟本質上的弊病，並開始對英國帝國主義政策採取批判態度，霍布森的經濟與社會思想發展可以說有著相當複雜的轉變與成熟。理解這個思想變化的過程，可以幫助我們更加貼近霍布森在布爾戰爭前夕的社會關懷，了解他反布爾戰爭論述與反帝國主義理論中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及一貫的對經濟學的興趣。

第一節 霍布森早年的思想發展

約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 1858-1940)，1858年7月6日生於英格蘭德比郡(Derby, England)，1940年4月1日卒於倫敦漢普史泰德(Hampstead Village, London, England)的家中，享壽八十一歲。

霍布森的父親是一個信仰低教會派(low churchman)的自由主義者，擁有一家地方週報《德比郡廣告與週刊》(*Derbyshire Advertiser and Journal*)。霍布森年輕時據稱健康情況不佳，他在德比郡接受大學以前的教育，然後就讀於牛津大學的林肯學院(Lincoln College)，主修古典文學。離開牛津大學以後，他先是擔任過教師，後來又開始為他父親的報紙寫作文章。儘管他大學時代學習古典文學，他卻沒有繼續在這個領域發展，他真正感興趣的是經濟學，以及經濟學如何實踐在解決當代政治社會問題之上。

然而，霍布森一生從未接受過任何正式的經濟學學術訓練，也一生未曾取得任何學界職位、頭銜與學術名聲。他理解與談論經濟的方式，與當時古典自由主義為主流的學院派經濟學者大不相同。這使得他未能生產具有系統性的理論，研

究方法與論點屢遭抨擊，成果也不被當代的主流學術界認可，他在 1938 年出版自傳《一個經濟學異端的告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eretic*, 1938)，就以異端一詞定義自己的經濟學研究在當代主流學院派的位置。¹而他未受 1870 年代的古典經濟學方法浸淫的結果，也使他能跳脫框架，對古典自由主義的觀點提出批判。他的經濟思想受到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的理想主義(idealism)很大影響，拉斯金批評當時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只重視物質的生產模式與數量成長，卻不能重視人本身的因素如何影響生產與消費過程，以及物質財富對人類生活品質的幫助。承襲拉斯金的關懷，霍布森質疑當代社會的財富分配有不公之處，提出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的重要性，試圖以重新分配社會財富來解決當代經濟問題。²

霍布森經濟思想最重要的兩個關懷，分別是「消費不足」(under-consumption)理論與對帝國主義的分析與批判。十九世紀中期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主要以賽伊法則(Say's Law)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供需平衡問題。賽伊法則相信生產者從事生產行為是為了消費，因此有供給就必然有需求，若有供需不均的現象，也只會出現在局部地區，社會整體是一個供需平衡的系統。³然而這個理論顯然無法應用於解釋 1873 年的經濟大蕭條，何以有工業產品過剩的現象。霍布森對於當代經濟學模型的質疑，部分也由此而來。在艾塞克斯教書的時期，霍布森與一位商人兼知名登山運動家墨梅里(Albert F. Mummery, 1855-1895)相識，他們對經濟大蕭條與生產過剩而消費不足的現象有同樣的興趣，兩人因此一同發展解釋消費不足現象的理論。1889 年，他們一起出版了《工業生理學》，這是霍布森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探討消費不足理論的開始。

¹ John A. Hobson,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eretic*(New York, United States: Routledge, 2011, first published in 1938), pp.7-8

² 拉斯金對霍布森的影響可參考：Peter Cain, *Hobson and Imperialism*(New York, United 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33-38。

³ 賽伊法則是由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提出概念，法國經濟學者讓-巴蒂斯特·賽伊(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將之系統化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

第二節 從消費不足理論走向新自由主義之路



《工業生理學》所欲探討的主題，便是英國 1870 年代以來，原本引領全球的工業經濟屢次遭遇經濟蕭條、產品滯銷的危機，這樣的危機何以發生。《工業生理學》一書所述的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現象，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供需平衡理論相悖。墨梅里與霍布森在書中提出，在經濟蕭條的景況下，消費者因為缺乏信心，與其將錢用於消費，寧可暫時儲蓄起來，導致生產過剩的情況惡化，貨物更加難以消售。他們對於現象發生的社會因素，也提出近於馬爾薩斯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生產過剩的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是必然發生的結果。⁴不過本書只探討了消費不足現象的成因，尚未發展出解決此現象的理論，如日後凱因斯經濟學理論以擴大公共支出與降低利率，解決資金過度儲蓄導致市場投資不足的方案。

本書談論貨幣與市場供需變化的論點，仍較偏向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他們在本書中的理論與古典經濟學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們認為資本的成長過於快速，消費者的需求量成長未能跟上，導致供需不均的問題，而非古典經濟學信條認定的供需必然平衡。但霍布森與墨梅里沒有貨幣供給量與貨幣數量理論的概念，他們與古典經濟學者對貨幣的概念一致，將貨幣視為單純的交易用媒介，認為人對金錢的需求僅是為了使用在貨物交易上，忽略了利率與市場上的貨幣供給量對於物價、薪資與儲蓄的影響。由於霍布森與墨梅里對於人們儲蓄金錢的意圖仍有上述盲點，故他們的理論仍未能闡明儲蓄與投資的關係，也無法進一步提出解決方法。然而光是提出市場供需不均的現象，就已是對當代仍為主流的古典經濟學的一大挑戰。凱因斯儘管對本書立論多有批評，但仍稱讚它：「在某個程度上，這本書標誌了經濟思想的新紀元。」⁵

⁴ Peter Cain, *Hobson and Imperialism*, p.28；原著請參考 A. F. Mummery, J. A. Hobson, *The Physiology of Industry: Being an Exposure of Certain Fallacies in Existing Theories of Economics*(London, United Kingdoms: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89)

⁵ John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New York, United States; ST Martin's Press, 1954), p.365

當代學術界知名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例如牛津大學的艾哲沃斯(F. Y. Edgeworth, 1845-1926)，對《工業生理學》一書評價不佳。特別是霍布森與墨梅里兩人皆不具備經濟學學術訓練，使《工業生理學》在學術方法上受到攻擊，理論也未得到當代學術界的重視。⁶事實上，《工業生理學》的消費不足理論主要由墨梅里提出，霍布森是秉持著古典自由主義的信條，受到墨梅里說服之後才與他一同完成本書。即使到《工業生理學》出版以後，霍布森仍然對消費不足理論抱持著游移的立場，1892年他去信予批評《工業》一書的經濟學者福斯威爾(H. S. Foxwell, 1849-1936)時，表示他對《工業》一書中的觀點並無狂熱的固執(fanatical pertinacity)。⁷霍布森在1893年加入具有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與勞工運動色彩的彩虹社以前，儘管在墨梅里的影響之下，已經開始注意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缺失，但他仍深受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思想上仍不能擺脫對自由市場與個人主義的信念。

從1892到1895年間，霍布森的作品顯示出他的傳統自由主義思想正被動搖，並慢慢轉型成一位新自由主義者，這一變化與他開始受到拉斯金作品影響，以及加入彩虹社有極大的關聯。彩虹社正式成立於1894年，是一個由自由主義者、費邊社員(the Fabians)以及社會主義者組成的學術社團，社內成員關注的主要議題有反帝國主義、促進政府對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的重視、改善自由黨與勞工運動的關係等，他們試圖引進部分社會主義的概念到自由主義思想之中，改革古典自由主義無法回應當代社會問題的缺陷。日後工黨首相拉姆齊·麥克唐諾(James Ramsay MacDonald, 1866-1937)正是此社團最富知名度與影響力的社員，霍布森也是創社社員之一。彩虹社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對勞工運動的同情以及反帝國主義的傾向，正是霍布森思想轉型的方向，並促使他以更具有批判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角度，繼續發展他的消費不足理論。

霍布森在他1894年出版的著作《現代資本主義的進化：機器生產研究》(*The*

⁶ Peter Cain, *Hobson and Imperialism*, p.29

⁷ Ibid., p.29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A Study in Machine Production, 1894)，以及 1895 年再版的《貧窮問題》(*Problems of Poverty*, 1895)中，開始將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現象，歸因於社會貧富差距與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霍布森認為，生產過剩與失業問題都是高度機械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具有的病徵，機械化生產造成生產成本降低、過程加快、市場競爭規模擴大，故生產者會更願意投入資金，追求更大的產量，而較不顧產品銷售的風險，導致生產過剩問題容易發生。而消費不足現象的成因，是因為這個社會中勞工階級收入偏低，消費的能力與水準低落；擁有購買能力的富人，則不願意將手中的財富投入市場消費貨物，寧可儲蓄資金或再投入生產競爭之中，這點又加強了生產過剩、勞工失業、消費更緊縮的惡性循環。因此要解決社會的貧窮問題，治本的方法便是終結消費不足現象的循環，改善社會的收入分配問題，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與政策亦必須改革。⁸

霍布森至此已經拋開了古典自由主義的束縛，轉型成為一個批判自由市場與關心社會財富分配的新自由主義者。但他要確立反帝國主義的思想，則歷經一個更緩慢的過程。儘管如此，在 1889 到 1895 年這段期間，霍布森發展出的消費不足理論，卻是他日後採取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布爾戰爭的關鍵基礎。

第三節 從新自由主義走向反帝國主義之路

霍布森在 1895 年詹森行動發生以前，他關注的經濟學思想議題，範圍僅限於英國國內，對於帝國與外國貿易議題並無深究的興趣。1895 年以前，唯一勾起他討論帝國與外國貿易興趣的議題，是引進外國與殖民地勞工的議題。由於霍布森十分關心與同情英國勞工境遇問題，他對於大英帝國的政府與資本家聯手在英國或殖民地引進非本地勞工，影響到本地勞工生計的現象提出過批判。除此之外，他並無對大英帝國殖民地的政治、經濟情況的知識，也無探索之興趣。對 1895 年以前的他而言，發展消費不足理論與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尚不需要將帝

⁸ Peter Cain, *Hobson and Imperialism*, pp.32-33

國與殖民因素納入考量。而且他在偶然間透露出的對英國的帝國擴張的看法，不僅沒有反感，甚至是傾向於支持的立場。霍布森在 1886 年反對愛爾蘭自治 (Home-rule)，在 1895 年支持英國應該確保在中國「門戶開放」後的貿易份額，顯示他當時尚不具有批判帝國主義侵略的意識。⁹

然而到了 1896 年初，詹森入侵行動事件爆發，使得英國在南非與布爾人政權的關係陷入緊張。行動本身透露出的帝國侵略意圖，亦遭致國內與國際輿論對主導者賽西爾·羅德斯與暗中協助的英國政府的抨擊。¹⁰霍布森亦在批評者行列中，他對此事件展露出相當的厭惡之情。他批評詹森入侵行動是羅德斯「推翻一個和平國家的政權以攫取黃金」(“to upset the government of a peaceful state to grab gold”)的行為，目的僅為滿足南非與英國的資本家的擴張與利益，師出無名的軍事行動破壞了南非的英國布爾關係與和平局勢。¹¹霍布森這時期的批判仍然透露出他的帝國主義傾向，他仍支持英國以和平協商的策略，統一南非地區。他在這個時期傾向於支持張伯倫所代表的自由聯合主義(Liberal Unionism)，並且相信將英國式體制推廣至世界其他地區是良性趨勢。但他對羅德斯與詹森入侵行動的抨擊言論中，已見他對倫敦與南非金融業勢力在南非殖民政治背後操作的認識，這亦成為他日後形塑金融帝國主義(financial imperialism)概念的起源。

1896 年以後，霍布森的作品與言論顯示出他受到更多彩虹社中反帝國主義者的影響，特別是一直堅定反對帝國主義的基進主義者(radicalist)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e, 1852-1901)。克拉克是最早提出金融資本主義概念者之一，他認為歐洲金融界透過國內外的投資影響政治局勢，並且批判金融界資本家煽動國內新興的國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結合舊的軍事主義(militarism)概念，使政府採取更具帝國主義傾向的對外政策。克拉克的論點將金融資本主義視為孳生帝國主義的溫床，而霍布森則逐漸接受了克拉克的看法，開始在作品中探討國際金融業對工

⁹ Peter Cain, *Hobson and Imperialism*, pp.53-59

¹⁰ 當時英國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曾與羅德斯有電報往來，顯示其知曉羅德斯與詹森的計畫並且支持，但事發後張伯倫否認支持，並公開對詹森入侵行動予以譴責。

¹¹ Peter Cain, *Hobson and Imperialism*, pp.59-61

業經濟的負面影響，並採取了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反省英國提升軍備、以武力迫使中國、非洲等地區簽訂自由貿易條約的政策，並非真正符合自由貿易精神的行為。¹²

霍布森開始在他的作品，基於支持柯布登式(Cobdenite)自由貿易精神的立場，結合他的消費不足理論，批評當代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¹³他在 1896 年出版的《失業問題》(*The Problem of Unemployment*)提出境外投資是國內資金過度儲蓄，導致必須擴張海外市場的觀點；在文章〈自由貿易與對外政策〉(“Free Trade and Foreign Policy”)，則更進一步批判上述將國內過度儲蓄的資金，轉往海外市場並鼓勵帝國主義擴張的做法，即是一種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弊病。¹⁴

霍布森自柯布登繼承而來的自由主義脈絡，使他對帝國主義擴張帶來的軍備擴張、國際衝突與殖民地人民受害的災難性結果格外反感。柯布登以來的自由主義者，相信各國為爭奪資源產生的糾紛，可透過推廣國際間的自由貿易和平化解。故霍布森也提倡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的精神，以國際間的和平協議取代帝國主義霸權，解決國際衝突與各國國內問題。

從上述作品中亦可看出，霍布森轉變了過去支持英國強迫中國開放市場的立場，開始批判英國的作為，已經不符柯布登式的自由貿易精神。他認為英國與歐美列強迫使非西方國家簽署自由貿易條約的行為，是假借自由貿易之名，以條約綁住、獨佔市場優勢；並藉此排擠其他競爭對手，造成國際局勢緊張，進而可能引發戰爭。這種行為實為保護主義，而非霍布森與柯布登提倡的以促進國際和平的自由貿易精神。¹⁵

然而，儘管霍布森在國際主義思想上承繼了柯布登式的觀點，他卻反對柯布登所極力提倡的國際貿易。這是因為霍布森思想亦承繼部分基進主義重視勞工權

¹² Peter Cain, *Hobson and Imperialism*, pp. 63-66

¹³ 所謂柯布登式的自由貿易精神，指的是以 1840 年代活躍於英國政壇的知名自由主義政治家理查·柯布登(Richard Cobden, 1804-1865)的思想與作為為指標的精神。柯布登力主廢除穀物法(Corn Law)、提倡小政府與個人自由，促使英國走向自由主義與自由貿易政策，是十九世紀中期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的代表性人物。

¹⁴ Peter Cain, *Hobson and Imperialism*, p. 69

¹⁵ Peter Cain, *Hobson and Imperialism*, pp.76-78

益、國家責任與社會改革的立場，使他重視國內市場與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他並結合消費不足理論，反對政府與資本家將原本可投入國內的資金與貨物投向海外市場；另外他對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批判亦比柯布登更為深刻，他對於國際金融家操縱市場與政治的成分更為警覺。這些原因使得霍布森不像柯布登和其他的自由主義者一樣，一貫地支持國際貿易。霍布森基於自由貿易的立場，並非支持用保護主義來防止國際貿易，而是希望透過扶植健全的國內產業，達到國內市場能自給自足的狀態，減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他這個立場也表現在 1902 年出版的畢生最重要著作《帝國主義》之中，由於與大多數自由主義者——這些人在反布爾戰爭和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往往與霍布森一致——的立場背道而馳，所以招來大量批評。因此，他在 1903 年以後也開始修改這方面的說法，認同各國之間仍須保持一定程度的國際貿易。¹⁶

本章小結

霍布森至 1899 年布爾戰爭發生前夕，已確立反帝國主義與批判金融資本主義的立場，這個立場又是建立在他對英國資本主義經濟弊病的批判、勞工權益與社會財富分配的關懷之上。這個立場促使他投身反對布爾戰爭的戰地記者工作，也促使他寫作出《在南非的戰事》、《好戰主義心理學》與《帝國主義》等批判帝國主義與金融資本主義的著作。我們可以從這些著作中了解到，他的反布爾戰爭與反帝國主義論述，雖然仍繼承了十九世紀中期古典自由主義的脈絡，卻又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政治與經濟思想有本質上的不同之處。他個人的思想轉型，或可幫助我們理解自由主義思想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在時代的經濟與政治秩序變動，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等新意識形態興起之間尋求新出路的其中一個樣貌。

¹⁶ Peter Cain, "J. A. Hobson, Cobdenism, and the Radical Theory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1898-1914",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1, No. 4 (Nov., 1978), pp. 565-584

第三章 霍布森的反布爾戰爭論述



霍布森在 1900 與 1901 年，先後出版了《在南非的戰爭：原因與效應》與《好戰主義心理學》兩部著作。前者乃霍布森以他在南非的訪談經驗為論證材料，並以同情布爾人獨立意願的角度，對導向布爾戰爭的英國帝國主義政策的批判論述。後者則是分析英國社會在布爾戰爭期間，出現的好戰主義(Jingoism)媒體與輿論現象，以及好戰主義對文明社會的傷害。兩部著作皆是他在布爾戰爭期間(1899-1902)的反布爾戰爭著作，深受當時英國反戰派與基進主義者的好評。而這兩部著作，在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理論成形的脈絡中，有著明確的思想與論述的經驗痕跡。在談論霍布森 1902 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之前，我們應當先理解他在布爾戰爭期間如何以反帝國主義的立場，批判布爾戰爭中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政策，以此構築其反戰論述，並延續到他日後的帝國主義理論框架之建構。

第一節 《在南非的戰爭》：反駁布爾戰爭的英國方正當性

霍布森以他在南非擔任記者的經驗，寫作了《在南非的戰爭：原因與效應》。於《在南非的戰爭》一書中，霍布森記錄了他在英屬開普與納塔爾殖民地，以及布爾政權川斯瓦共和國與橘自由邦的親身經歷與當地人的訪談，探討自詹森行動(1896)至布爾戰爭前夕(1899)，南非各個白人族裔對英帝國與布爾政權間的關係、對當地政治與經濟情勢的觀點、約翰尼斯堡外僑實際處境與感受以及將至的戰爭等議題。霍布森走訪了開普殖民地(Cape Colony)、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位於蘭德金礦附近，新興的礦業城市，有最多的外僑人口)、普利托里亞(Pretoria，川斯瓦首都)與布隆方丹(Bloemfontein，橘自由邦首都)等地，以幾個常見的英國人對南非情勢的想法和疑問作為主題，並以他的親身經驗、調查與訪談，證明部份事實以及當地英國人與布爾人的觀點，與英國民眾從資本家控制下的媒體接收

的被刻意扭曲的資訊，有相當大的落差。

霍布森寫作此書，是為透過更貼近南非當地情勢的一手報導，向英國本土的讀者澄清南非情勢的誤解與偏見，並對抗主戰派的殖民大臣張伯倫與南非帝國公使米爾納刻意煽動與操作的愛國主義輿論，瓦解英國發動布爾戰爭的正當性與必需性論述。

本書分為三部，第一部是〈1899 年的布爾共和國〉，內容主要是霍布森自己對英屬殖民地、川斯瓦與橘自由邦等地的政經社會局勢觀察，並引述當地人的意見佐證其論述；第二部〈蘭德資本家的政策〉則進一步批判資本家以利益操縱帝國政策與媒體輿論的實情，論證布爾戰爭的動機只為資本家利益，並無政府宣稱的正當性；第三部〈解決之道〉則探討南非當前的族群分布、農工產業狀況，提出對南非地區未來發展的看法與展望。

自從詹森行動以後，南非問題開始受到英國輿論的重視，主導南非殖民政策的張伯倫與米爾納更大肆在英國國內炒作川斯瓦英國外僑的不公境遇(the grievance of the Uitlanders)與倫敦和約中川斯瓦的主權歸屬爭議問題，來合理化英方對川斯瓦的強硬要求；並且以媒體操作強調南非的種族衝突，將布爾人塑造為衝突中主動尋釁的一方，以激發英國輿論的愛國意識。

外僑缺乏參政權、在川斯瓦受到不公境遇的問題，是英帝國政府用以合理化介入川斯瓦內政的重大理由之一。英籍僑民在川斯瓦被剝奪參政權利的形象，激起英國輿論的廣泛同情；然而霍布森在本書則論證了投資蘭德金礦的大資本家和約翰尼斯堡的商店業主，多數實則是具有歐陸國籍的猶太裔，並且與猶太裔掌握的國際金融集團有密切往來。他在本書第二部〈蘭德資本家的政策〉的第一章，提出英國政府對南非的強硬外交政策，實際上是為了這些以猶太裔為主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不是英國民眾想像的中下階級的英籍外僑。¹《在南非的戰爭》更證明了外僑的不公境遇，是被英國媒體刻意渲染的議題。霍布森在經過訪談以後，

¹ John A. 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London, United Kingdom: MacMillan, 1900), pp.189-197, 198-205

發現實際上約翰尼斯堡的外僑，並不在意缺乏參政權的不公政治待遇。英國本土民眾心目中想像的英籍外僑在川斯瓦受到不公平對待的痛苦，外僑本身卻無相同感受。在第一部第九章，霍布森更針對參政權問題，提出這些外僑實際上多半仍不願放棄英國或他國國籍，故未能得到川斯瓦的完整公民權的說法，來證明川斯瓦共和國並非英國民眾想像的落後國家。²

英國民眾對布爾人社群與國家有許多負面刻板印象，諸如司法體制落後、缺乏自由與平等概念、政府腐敗等阻礙近代國家發展的特質，這使他們更加相信具有良好體制的英國介入川斯瓦政治體制，維護其僑民權益，是具有正當性的作為。霍布森以一個英國人的眼光，在本書也認同川斯瓦共和國有其政治與經濟問題。他認為川斯瓦官僚體系缺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並且傳統家族人際網絡影響太大；另外尚有行政部門貪污腐敗、財政入不敷出、無法解決炸藥產業遭壟斷等問題，這些問題是川斯瓦的政治、司法與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³但他在批評川斯瓦政府弊病的同時，也致力於為布爾人發展近代化國家的努力辯護。他提到多數與他接觸的川斯瓦布爾人，均具備開放心胸和自由思想，有維護司法公正的概念，願意改革相對落後的國家體制，並非心胸狹窄、頑固、排外的族群。⁴霍布森在討論到川斯瓦總統保羅·克魯格時，批評了他在國內的獨裁，並提出布爾人實際上並不樂於接受獨裁統治的觀點。但他也強調克魯格之所以能在川斯瓦的議會(the Raad)得到支持，遂行獨裁，與川斯瓦面臨的英國帝國主義龐大壓力處境有絕對的關係。⁵

在英國方面的輿論，流傳著一種南非布爾人有意驅逐英國勢力，建立布爾人

² John A. 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pp.63-72

³ 本段所論霍布森提出的幾個川斯瓦共和國失政問題，分見於《在南非的戰爭》第五、十、十一與十二章。請參考：John A. 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pp.32-39, 73-83, 84-87, 88-95

⁴ 關於司法公正概念，霍布森以一個實際審判案例，舉證川斯瓦的布爾人陪審團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願意向法官提出開釋英籍被告。詳見：；另，霍布森亦論證被用以宣傳外僑境遇不公的另一個範例「艾德格謀殺案」(the murder of Edgar)，身份為川斯瓦警方的兇嫌仍被移送法辦，並無司法刻意偏袒布爾人的問題，英國政府與媒體對此案大作文章是刻意強化川斯瓦司法「落後」、「野蠻」的形象，合理化後續的戰爭侵略行為。詳見：John A. 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pp.57-58

⁵ John A. 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pp.22-31

主導的南非國家的說法。⁶霍布森則認為實情正好相反，布爾人在 1896 年以後對英國展現出的敵意與不滿並非主動尋釁，而是出於防衛的心態。他強調川斯瓦布爾人並非不願與外界溝通協商，而是經歷詹森行動揭露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意圖，與英帝國強硬外交政策相逼，才使他們對英國產生敵意。川斯瓦在 1896 年開始增加軍費開支，並非為侵略英屬殖民地，反之是為了防禦英國的入侵。川斯瓦方面對與英國間衝突的態度，事實上並未如此強硬。在 1897 年，他們曾在布隆方丹會議(Bloemfontein Conference)提過解決外僑參政權的法案，也曾要求海牙國際私法會議(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r HCCH, for Hague Conference/Conférence de La Haye)所用的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但英國一方卻表現出強硬的態度，認為川斯瓦境內的英屬臣民應由英國自行處置，拒絕接受第三方仲裁做為解決問題的方案。⁷

橘自由邦與英國並無直接衝突，卻在此時期選擇與川斯瓦站在同一陣線抵禦英國，也是基於同樣的心理。他引述了一位橘自由邦的年輕法官的說法，說明了部分生活在獨立政權下的布爾人對英帝國的看法：

這些共和國真的是英國在非洲勢力的肉中刺嗎？肯定不是。我們清楚英國統治優於其他強權之處，而且我們珍視這份(英國)勢力能供給我們的保障。如果我們得以保持我們當前的完全獨立，而英國霸權受到德國或其他強權嚴重威脅的時代來臨，她將會在這些共和國中發現她最強健與最堅強的捍衛者，因著我們的獨立性與獨立維持的精神而更強健更堅強。但被英國征服與挫敗，我們的敬重將轉為厭惡；我們臣服只因我們必須臣服，只要我們必須臣服；自由的精神將不死，而共和國即使與英國結為盟友，仍將維持不滿的中心，等待起身奮戰的機會。⁸

霍布森透過這個說法，說明共和國的布爾人對英帝國在南非的統治原本並無敵意，甚至支持；然而英國企圖侵犯布爾人的獨立，布爾人亦將起身反抗。他也在第十

⁶ Ibid., pp.99-118

⁷ John A. 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pp.169-170

⁸ Ibid., p.145

四章〈據稱的荷蘭陰謀〉，力主英屬殖民地中布爾人對英帝國的忠誠，他認為這些人確實對其在英國統治下的境遇有所不滿，但這些不滿情緒絕非開普殖民地的進步黨(the Progressive party)所控訴的不忠(disloyalty)。⁹

英屬南非殖民地面對南非衝突的態度，也更傾向和平協商。在第一章〈開普殖民地的政治情況〉，霍布森說明英帝國政府對南非政局的理解與處理方式，與開普的官員有所落差。他們反對張伯倫與米爾納刺激衝突的政策：

開普的官員們，儘管在看待克魯格先生的政策上意見分歧，卻團結一致地反對張伯倫—米爾納毫無同理心的作法。他們認為，米爾納爵士完全不能理解布爾人的性格特質，而且也永遠不能感同身受。¹⁰

開普官員一致地反對來自帝國中央，對布爾人與南非絲毫不理解也不願同理的米爾納的作風。他們認為由於米爾納無法了解布爾人方面的領導人克魯格的性格，這個前提注定了米爾納主導的協商政策的失敗：

米爾納爵士的方法是將克魯格當成一位十九世紀的新式外交官，而不是一位思考緩慢、多疑的十七世紀清教徒農夫，而建立在這些立場上的會議就注定失敗。¹¹

誠然，張伯倫與米爾納等主戰派的南非政策，原本便非以維持和平為主要目的，透過強硬態度施壓布爾人，使其主動屈服英國要求或開戰，才是其政策的意圖。但開普官員基於長久居住南非的經驗，無法與英國的主戰派一樣，對布爾人使用武力或戰爭手段抱持樂觀看法：

樂觀者的看法認為不出數月，就能看到一個最終結果；那就是在我們展示或真的使用了武力以後，我們應該就能使布爾人認清我們的力量，而在這道德或生理上的挫敗以後，他們將會立刻「知道他們的位置」。這種想法被他們（前述的開普官員們）視為全然的幻想。¹²

⁹ Ibid., p.117

¹⁰ Ibid., p.7

¹¹ Ibid., p.7

¹² Ibid., p.8

對於開普殖民地的英國官員而言，處理南非問題與英國—布爾關係的方式，必須先理解彼此的性格與各政權間的利益關係，才能清楚判斷局勢，並帶給雙方最好的解決方案。但來自英帝國中央的米爾納的作風，卻是完全無視於當地現況，僅以既有的學識和思維，強硬地推動政策，對於布爾人絲毫沒有尊重。而就多數開普官員的看法而言，挑釁布爾人對英國在南非的殖民發展並沒有好處，雙方有相當頻繁的商業往來，戰爭將會損害彼此的利益；而且布爾人方面也絕不是遠在英國本土的人們所想像的，一旦進入戰爭，僅需幾個月就解決的小問題。

至此，霍布森已對南非的紛擾做出清楚的結論，他認為 1896 年的詹森行動破壞了布爾人對英國的信任感，埋下衝突的因果，而將衝突引向戰爭一途的責任，則在於英國的帝國主義外交政策。詹森行動已造成川斯瓦與橘自由邦難以信任英帝國維持和平的誠信，張伯倫與米爾納曲解倫敦和約的主權定義，強硬干涉川斯瓦內政與煽動國內輿論的政策，使雙方缺乏互信的情勢更火上加油。張伯倫以外僑參政權作為理由，要求川斯瓦改善，形同跨過川斯瓦主權，直接指導其內政問題。直到 1897 年英國、川斯瓦與橘自由邦三方代表在布隆方丹協商會談，英國仍維持上述強硬態度。這樣的態度對於已對英國失去信任的川斯瓦與橘自由邦而言，自然難以接受；為了堅持主權不被英國侵犯，布爾共和國便更傾向於整軍經武，以面對可能的侵略戰爭。英國表面上並未主動求戰，卻用主權爭議逼使布爾人選擇武力相抗，成功將布爾人塑造成侵略者的形象，對國內輿論獲得戰爭的正當性。霍布森透過《在南非的戰爭》，揭露英國在布爾戰爭中的正當性，是被依循資本家利益的不當外交政策所刻意塑造出來，而且這一政策完全無視原本英國—布爾關係中可能的和平處理方式，最終將雙方逼向戰爭之路。這一結論將戰爭的責任歸給了資本家的煽動與張伯倫主導下的南非政策，破除了英國方面原有的正當戰爭理由。¹³

最後，霍布森以本書第三部〈解決之道〉，分析南非現實的族群人口比例與農工產業狀況，探討英帝國未來欲主導南非發展的可能性與侷限性，並闡述他理

¹³ John A. 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pp.155-160; pp.161-186

想的南非問題解決方式。霍布森指出，南非的英籍人口總數比布爾人少，而從南非地區的農業與工業發展情形看來，未來英籍人口的成長潛力也相當有限。英籍移民若要在南非發展，農業上必須先能自給自足，又能供應龐大的礦業人口。然而南非地區並非一個理想的務農環境，土壤不夠肥沃且雨量稀少，較為苛刻的農業條件難以支持英籍移民大量成長。工業方面，南非地區最倚重的仍是金礦與鑽石兩項礦產資源，但根據霍布森在書中出示 1890 年以後金伯利(Kimberley)的鑽石礦業勞工數量統計，鑽石礦業的勞動力需求成長極少，沒有吸引新移民的潛力。蘭德金礦以外的南非各個金礦，開發價值都不如蘭德金礦；其他的礦產如鐵礦儘管豐富，卻尚未形成產業，短期內都無法大幅增加吸引英籍移民的空間。

此外，另一個妨礙南非吸收英籍移民的原因，是非裔勞工的薪資遠低於白人勞工。儘管非裔勞工佔礦業勞動力的比例，有白人勞工的九倍之多，付給白人勞工的總薪資還是高於全部非裔勞工，不難想見資本家更樂於僱用便宜的非裔，而非僱用更多英籍白人勞工。¹⁴而布爾人與英籍移民即使兩者人口相加，也遠低於南非原住民(Kaffir)人口的事實，是在當地作為少數的白人族群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¹⁵因此，英國與布爾人必須考慮以聯邦或其他和平協商的方式共同發展。¹⁶這並非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呼籲，而是在現實情勢中，既然英籍人口低於布爾人口的事實難以改變，便注定了英國在南非發展，不可能無視布爾人的勢力而獨自稱霸，雙方必須尋求彼此能共存的发展方式。

綜上所述，霍布森在《在南非的戰爭》的反布爾戰爭論述，主要的論點可被歸結為二：第一點是這場戰爭是可被避免的，不僅雙方皆有和平協商的意願，雙方未來在南非地區要有良性的發展，亦必須互相合作。第二點則是論證和平協商之所以未能成功解決南非問題，並非布爾人不願合作，而是英國政府只為國際金融家、資本家(主要又多為非英國籍的猶太裔)的利益，採取帝國主義傾向的外交政策，並以錯誤的資訊誤導英國輿論，才導向戰爭一途。他一方面透過實地的研

¹⁴ Ibid., pp.257-278

¹⁵ Ibid., pp.279-295

¹⁶ Ibid., pp.296-316

究破除偏見，證明了布爾戰爭是一場不正當也不必要的戰爭；另一方面，他也以布爾戰爭與南非問題做為實證，說明當代的金融帝國主義如何結合政界、商界與媒體，達成帝國主義擴張的運作模式。這個運作模式便是他寫作《帝國主義》的批判理論的基本結構，《在南非的戰爭》則是他形塑帝國主義批判理論的實證材料來源。

第二節 《好戰主義心理學》：媒體結構與群眾心理

霍布森的反布爾戰爭論述將戰爭責任歸結於意圖獨佔南非利益的國際金融家與資本家們，而帝國政府則是透過軍事與政治手段協助資本家達成目的的共同正犯。這個共犯結構的其中一種重要的運作方式，便是控制媒體的報導與資訊來源，製造支持戰爭與帝國主義的輿論環境。霍布森在著作《在南非的戰爭》以及1901年出版的《好戰主義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Jingoism*)中，對媒體結構的操作手段，以及群眾好戰心理與媒體操作的關係，亦有細膩的觀察與批判。¹⁷ 儘管英國國內的群眾好戰心理並非造成戰爭的主因，他們易受媒體影響與操縱的集體性格，卻是有利於當權者推行帝國主義與戰爭，並阻礙反戰派勢力發揮影響力的一個要素。而霍布森更注意到，這樣的現象不僅止於促進英國的帝國主義發展，更威脅到英國的文明社會與言論自由。

《在南非的戰爭》第二部第三章〈特許媒體〉(*Chartered Press*)，霍布森先分析了英國與南非地區英語媒體受資本家控制的情況。多數南非地區的英語媒體，均為在蘭德金礦業擁有利益的資本家所控制，只提供偏向英帝國與資本家一方觀點的資訊；而且媒體報導經常刻意扭曲、誇大川斯瓦等地的英籍僑民不公待遇問題，以達煽動輿論支持英帝國併吞布爾共和國的目的。這些報導擷取的資訊極為

¹⁷ 所謂的好戰主義 Jingoism 一詞，來自 1878-1879 年俄土戰爭期間英國流行歌曲的合唱詞 “We don't want to fight but by Jingo if we do”，後來 Jingo 一詞就成為媒體與社會用以指涉提倡戰爭、極端愛國主義的用語。霍布森對 Jingoism 一詞的說明和定義則可參見：John A. Hobson, *The Psychology of Jingoism*(London, United Kingdom: Grant Richards, 1901), pp.1-14

片面，與南非當地人認知的情況有很大的落差。¹⁸

霍布森在《好戰主義心理學》中將上述的資本家—媒體結構分析得更為深入與全面。南非媒體的偏頗立場乃受資本家直接控制之故，那麼英國立場各異的全國性大報與數千家地方性報社，為何在布爾戰爭中幾乎一面倒地支持戰爭，而非呈現多元的觀點？

所有倫敦具影響力的報紙，皆自屬於開普敦與約翰尼斯堡報社成員的特派記者處取得他們的南非情報，並都於去年從特別旅行記者處取得資訊，以增刊兩則案例，這些記者大多數的資訊又從南非的報社取得。特別有兩家對這個國家中的受教育階級心靈影響最大的倫敦報紙，《泰晤士報》(*Times*)與《每日新聞》(*Daily News*)，前者從《約翰尼斯堡之星》(*Johannesburg Star*)的新任編輯處接受資訊，後者則是受到《開普時報》(*Cape Times*)編輯的指引。兩家主要的電報公司也從《開普時報》與《開普百眼》(*Cape Argus*)報社處取得大多數的開普敦情報，其中一家公司接收的川斯瓦資訊，則由一位約翰尼斯堡南非聯盟(*South African League*)的顯要的行政組成員餵養。

19

此乃因英國本地媒體僅能向南非媒體或是僅有的幾家通訊取得新聞資訊，而這些南非媒體皆受南非資本家掌握。例如《開普百眼》，這份報紙早在戰爭之前便已被羅德斯等人買下。²⁰霍布森因此這樣評論道：

英國的媒體一致性因此可追溯到開普敦與約翰尼斯堡的特定報社上。現在，如果有半打報紙是獨立和可靠的機關，它們提供的新聞，與它們強行施加在英國媒體與英國大眾身上的強硬方針，它們的影響力或許還能稱得上合理。但它們既不獨立也不可靠；它們就是購買和接收(*bought and kept*)的媒體中的成員。²¹

¹⁸ John A. 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pp.206-228

¹⁹ John A. Hobson, *The Psychology of Jingoism*, pp.110-111

²⁰ *Ibid.*, p.112

²¹ *Ibid.*, p. 111

霍布森對於媒體中的從業人員是否能秉持良知，不偏不倚地追尋與呈現真實或媒體自身的觀點，則有更悲觀的描述與批判。他先是批評了被任命為上述這些大報的編輯，如《開普時報》的嘉瑞特(Edmund Garrett, 1865-1907)，從《泰晤士報》轉至約翰尼斯堡任職的莫尼潘尼(William Flavelle Monypenny, 1866-1912)等人，之所以得以被指派報社編輯一職，都是因為他們「贊同贊助者的方針」。一旦他們沒有遵循這一原則，他們「將立刻被遣離他們的崗位，換上其他願意書寫(贊助者)想要的新聞的編輯。」²²而即使是一開始沒有明顯立場或關係的記者，在南非的環境亦很難獨立思考，跳脫由資本家掌握的資訊環境：

一位聰明的年輕記者被帶到開普敦或約翰尼斯堡，會自然地從有經驗與能幹的當地生意人處形塑他的觀點與資訊，他們提供他無法確認的「獨家資訊」，並介紹會告訴他「應該知道甚麼事」的人物給他。²³

霍布森所描述的媒體取得資訊之狀況，就是這麼一個被資本主義所盤據，缺乏獨立與自由媒體精神的悲慘情況。²⁴

而在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等英國殖民地，媒體的資訊來源主要來自倫敦同業，戰爭新聞同樣受到支持戰爭立場的媒體壟斷。故英國與殖民地的讀者，只能接受到偏頗英帝國一方的新聞，難以接觸布爾一方或其他立場的意見與資訊。暴露在此片面的媒體環境中，群眾自然更容易接受支持戰爭與帝國主義擴張的論述。²⁵

輕易接受媒體提供的訊息而不加思辨的群眾，也是霍布森在《好戰主義心理學》批判的對象。他批評英國群眾在布爾戰爭期間，拋棄了個人的自主思辨能力，將心智與行動均交付於全國群眾組成的暴民團體(mob)之中，盲目地隨媒體起舞，

²² John A. Hobson, *The Psychology of Jingoism*, pp.114-115。關於米爾納與開普時報編輯嘉瑞特的關係，在這篇文章有更進一步的介紹和闡述：A. N. Porter, "Sir Alfred Milner and the Press, 1897-1899", i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6, No. 2 (Jun., 1973), pp. 323-339

²³ John A. Hobson, *The Psychology of Jingoism*, p.115

²⁴ 十九世紀晚期的國際通訊與媒體的技術與產業環境研究，可參考：Donald Read, *The Power of News: The History of Reuters*(Oxford, United Kingdo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nd ed.; Simon J. Potter, *News and the British World*(New York, United 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²⁵ *Ibid.*, pp.119-120。另外關於澳紐加等英國白人為主流社群的殖民地媒體如何報導布爾戰爭，可參考：Simon J.Potter, *News and the British World*

無法判斷媒體提供的資訊是否有偏頗或錯誤之虞。霍布森更提出一個令人驚訝的現象：這些暴民並非全是無知粗人，而更包含了受過教育、有文化的階級。

現在，最令人驚訝的戰爭狂熱現象，是由受教育的階級所展現的輕信 (credulity)。……但教育本來被預期教導人們，接受與吸收這兩年間經由媒體大量灌輸的資訊潮流時保持謹慎。我們的受教育階級通常蔑視相信從報紙讀到一切資訊之人，以及在政治或經濟的精微之處，發表急切武斷的評價之人。然而這些有文化的 (cultured) 人們，大多數卻與他們鄙視的街頭人等一般，順服地將他們的才智交由大眾偏見與激情來統御。²⁶

霍布森所批評的非理性群眾，自然也包括教育程度較低的中下階級。然而在上段文字中，他卻特別強調「受過教育」、「有文化」的階級在布爾戰爭期間的資訊判斷能力與受到偏見影響的程度，跟這些人所鄙夷的「街頭」的中下階級別無二致。具有高等教育水準的上流階級與中產階級，在其他議題上表現了他們不同於中下階級的理性與智識，但在布爾戰爭的議題上，這些具有知識的階級，判斷言論、資訊真偽的方式，卻十足的反理性與偏頗。一種情況是輕信所謂「權威」：

最受尊敬的案例，或許可從那些說過下數言論者中得出：「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去探討這件事的功過；但我知道我們在現場已經有了米爾納爵士這位能幹、公正的人物。他已經做了一番全面調查，而我接受他的判斷。」認同權威總是危險的，但並沒有不誠實之處；有過之處，在於不周全地輕信。²⁷

因為米爾納爵士的學歷、聲譽、現任南非帝國公使職務賦予他的專業與權威，而全盤接受其判斷的知識階級大有人在，他們不願以理性質疑權威犯錯的可能性。與前面《在南非的戰爭》一書中所提，南非官員對米爾納不理解南非與布爾人的批評相比對，這個將米爾納視為絕對正確的迷思便顯諷刺。

另外也有一部分的人是人云亦云，在大量「證據」的面前失去自己的判斷力：

²⁶ John A. Hobson, *The Psychology of Jingoism*, p.21

²⁷ Ibid., p.99

那些所謂受教育的人們的心靈是如此固執，認為一個定論只不過意味有一定數量的某種證據呈現在它們面前，或僅是一段被重複了好幾次的論述。

28

儘管這些支持好戰派說法的「證據」往往都未經過考證，且來源單一，有時甚至是重複同樣說法的文章論述，但許多知識階級卻疏懶於判斷，因為「許多證據顯示」便相信媒體或輿論流傳的說法。誠然，反戰派的書籍文章並沒有在戰爭期間被好戰派淹沒而消失，不過它們是否能起到破除謠言和錯誤的作用？

我們多少人有過經驗，提供一為受教育的好戰派人士一本反戰書籍或小冊子，卻接到這種回覆：「這是親布爾派的。我不讀。」好戰派報章雜誌在被揭發很久以後，還能安心地繼續重複最無恥的謬誤，僅是因為它們知道它們的讀者，雖然完全覺察到另一種立場的報章雜誌存在，卻不會去看那些反戰的報紙。²⁹

知識階級由於已有成見，而不願接受另一立場的說法，自然也沒有修正看法的機會。霍布森認為這種偏頗的媒體識讀方法，對傳達大量錯誤資訊的好戰派媒體是最好不過的生存環境，因為他們有已經失去理性判斷力，卻還是受到社會尊敬的知識階級支持，他們的聲譽幾乎不可能因為被揭露真相而損害。這種現象不僅是媒體長期餵養偏頗資訊造成的，不懂得識讀新聞真偽而全盤接收的英國受教育者，更加强了媒體的惡行。

從十九世紀中期以降至布爾戰爭期間的英國媒體發展史，以及英國自由派知識份子對媒體想法的轉變脈絡來看，霍布森的媒體與輿論相關批判，其實就是一個自由派人士對於媒體作為追求真實、促進大眾智識的工具徹底失望的表現。在十九世紀中期，英國的自由派人士對於透過教育普及與媒體，以教化大眾、培育理性思辨能力的可能性是樂觀的。然而到了 1880 年代，隨著媒體走向大眾化與市場取向，自由派透過媒體來教育大眾的理念受到挫敗，這一媒體與社會演變的

²⁸ Ibid., p.100

²⁹ Ibid., p.101

方向，被自由派視為媒體的墮落，對理性與教育大眾的態度亦轉為悲觀。³⁰

但霍布森對理性與教育的悲觀，並不僅針對中下階級與勞工階級，對自身理性智識抱有優越感的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他的批判更為劇烈。對受教育階級的銳意批判，顯示他將好戰主義視為一種屬於全英國社會，跨越階級與知識水平的普遍問題。這代表霍布森眼中的教育與理性的失敗，絕不僅是勞工階級獲得教育與參政權之後的現象，理應展現高等教育知識水準來思辨的文化菁英階級，在戰爭期間的非理性表現更令人驚駭，證明了英國教育從未成功地教導所有英國人理性思辨與媒體識讀能力，是整個社會不分階級面臨的危機。³¹

這個非理性現象造成的危機，遠不僅是非理性言論本身提倡的暴力，更在於一個文明社會基於愛國主義狂熱，直接或間接地扼殺非愛國立場的言論自由。在《好戰主義心理學》的第二部中，霍布森就從媒體讀物與反戰集會兩個層面，提出英國社會在布爾戰爭期間對自由的侵害。戰爭時期的多數英國媒體很少刊登反戰立場的文章，反戰書刊甚至受書店抵制，這些媒體與書籍通路明白地展現其愛國立場，視抵制另一種聲音為正當的愛國行為。霍布森將此現象，視為言論自由受到破壞：

實質上，英格蘭已不再存在一家自由媒體，為重大政治議題的優質討論，提供完全安全的環境。³²

而在全國各地舉行的大小反戰集會，亦遭到愛國主義者的脅迫、破壞。這些以愛國主義為名的行為，嚴重地危害了英國的言論自由。儘管英國的法律制度仍保障任何立場的言論，但社會內部的實際情況，卻是兼具愛國主義與支持戰爭立場者，挾多數優勢與愛國的正當性，迫使不符合愛國主義或好戰主義立場的言論，無法在自由、對等與安全的環境下發聲。這已經嚴重傷害了英國人一向引以為榮的自由主義傳統，文明社會理應朝追尋和平、自由、平等等進步價值的方向進步，如

³⁰ 關於英國自由派媒體史觀的討論，請參考：Mark Hampton, *Visions of the Press in Britain, 1850-1950* (Illinois, U.S.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04)

³¹ John A. Hobson, *The Psychology of Jingoism*, p.25-27, 97-103

³² Ibid., p.119

今好戰主義卻使之倒退。³³



本章小結

霍布森的反布爾戰爭著作，從證明英帝國發動布爾戰爭的責任並批判其正當性起，到批判戰爭時期資本家操作的媒體與輿論對英國民主與自由傳統造成的傷害，這樣的論述說明了霍布森之所以選擇反對布爾戰爭的立場，乃是基於他對文明價值的看法與同時代的帝國主義者截然不同。霍布森在《在南非的戰爭》中力主布爾人並不具備英國社會刻板印象中的野蠻，而是能夠以開放心胸學習議會民主、朝工業化現代國家邁進的國族；他在《好戰主義心理學》之中則反過來批評英國人在戰爭時期所暴露出的野蠻嗜血，對於愛國主義情緒侵蝕到英國言論自由傳統深感憂心。這顯示霍布森對於西方式的議會民主與工業文明價值極為重視，並認為實踐與推廣這些價值，是全人類不分地域必須追求的目標，而他反對布爾戰爭、愛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便是因為西方帝國強權正在以帝國主義的暴行傷害他們所標榜的文明價值。布爾戰爭在霍布森的反戰論述中，既是英帝國對弱小國族的外部迫害，也是英國社會與文明內部的自我墮落。

³³ Ibid., p.125-139

第四章 在反布爾戰爭脈絡下形成的反帝國主義理論



在出版了兩部以反布爾戰爭為主題的著作以後，霍布森緊接著在布爾戰爭結束的 1902 年寫作了《帝國主義：一份研究》，系統性地批判帝國主義背後的資本主義與種族主義因素，並呼籲以國際主義這一合乎自由主義與人道主義的政治方向，取代殘暴與剝削的帝國主義政策。從本作與本文第三章所分析的反布爾戰爭論述，可以看出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理論中的諸多論點，與他在布爾戰爭時期的研究經驗與論述思維有諸多相似、承襲之處。本章將分析《帝國主義》一書中的論點，並與第三章分析的兩部反布爾戰爭著作的內容相對照，試著揭示霍布森在布爾戰爭前夕至戰爭結束這段期間的思想脈絡發展過程，理解他在反帝國主義與反布爾戰爭論述背後的關懷，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弊病的深思，以及對受帝國主義所壓迫族群的關懷與同理心。同時也必須正視霍布森並未脫離其時代，仍以家父長主義的心態與西方文明本位的觀點，來思考當代殖民問題的事實。

第一節 帝國主義理論的形成

霍布森在布爾戰爭結束的那一年，亦即 1902 年，出版他畢生最知名的著作《帝國主義：一份研究》。在本書中，霍布森分析帝國主義理論的脈絡與帝國政策的實踐成果，批駁帝國主義的正當性與實際效益；而他也透過對國際金融、工業資本與歐美列強政府間的政經互利結構的分析，建立起連結帝國主義擴張政策與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理論，並影響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相關研究。儘管霍布森本人絕非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連結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研究方法，卻影響了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Vladimir Lenin)、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促進馬克思主義在批判帝國主義方面的理論發展。除此之外，史學界也吸收了霍布森的理論，以資本主義帶動帝國擴張的觀點，來論述 1870 年代到一次大戰前的英帝國殖民史。

《帝國主義》一書在學術史上的貢獻與影響力不可不謂巨大。¹

儘管《帝國主義》一書的主旨與內涵，並不在於提供反布爾戰爭之論述，然而考量其出版的時間，以及其批判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亦是繼承自霍布森在布爾戰爭前期對南非問題的研究，則探究其反布爾戰爭論述如何在《帝國主義》一書中被擴展成反帝國主義理論，能助我們更深入理解霍布森的思想與反戰立場之脈絡。因此本節的內容將會簡要分析霍布森在《帝國主義》中的帝國主義理論結構，並檢視其理論與本文第三章所述及的反布爾戰爭論述之間的連結。

在分析霍布森帝國主義理論結構之前，我們必須先釐清霍布森在本書所使用的「帝國主義」一詞，其指涉的定義與時間範圍為何。首先，霍布森所談的帝國主義，指的是歐洲列強從 1870 年代開始的帝國擴張行為與思想，1870 年代以前歐洲在世界各地的擴張與侵略，則非他在本書所批評的對象。然而，難道 1870 年代以前歐洲在世界其他地區的侵略、擴張、衝突與劃分勢力範圍，皆不算是帝國主義嗎？這個矛盾肇因於霍布森對帝國主義的定義，與二十世紀後殖民理論所談論的帝國主義相當不同。

在這位活躍於十九世紀晚期的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中，應該被批判的帝國主義擴張行為，僅限於將其他族群生存的領土，以軍事跟政治的手段納入帝國的正式統治之中，並剝削其政治與經濟權益的行為。但霍布森並不批判將英國式的體制與文化輸入他國，將英國籍移民移入他地，將該地改造成以英國居民與文化為主流的行為。反之，在他的帝國主義批判理論中，霍布森展現出強烈的對 1870 年代以前英國在加拿大、紐西蘭與澳洲等地所建立的代議民主自治政府的讚頌，他對 1870 年代以後帝國主義的批判，有相當大的成分是來自於對英帝國擴張未能持續推廣自治體制的不滿。他在批判帝國主義理論上的盲點，則須從他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兩者的不同詮釋來理解。

¹ Daniel H. Kruger, "Hobson, Lenin and Shumpeter on Imperialism",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6, 1955, pp.252-259



霍布森在《帝國主義》正文開始之前，先提出他對國族主義(nationalism)、殖民主義(colonialism)與帝國主義三種政治主張的定義區別。霍布森相信以同一文化作為基礎的國族乃既存事實，他並引用彌爾(John Stuart Mill)對國族性(nationality)的定義：「如果一群人因為共同的情感而團結起來，這份情感並不存於他們與他者之間，那麼他們可謂一個國族。」²而國族主義運動就是尋求具有同文化族群在政治上的整合或解放，建立族群認同與政治疆域得以結合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國族主義運動在霍布森的定義之中，是屬於自然的政治運動，舉例來說，北義大利與奧地利的聯盟因為雙方文化與國族不相同，故是「不自然的」(unnatural)，將之解除的義大利國族主義運動才是「自然」的發展方向。³

霍布森對殖民主義的看法，與今日學界與社會將殖民主義看成帝國主義的一環的觀點頗有相異之處。霍布森對殖民主義的定義如下：

殖民主義的定義構成，在於國族的一部分移民到空無一人或鮮有人居的土地，移民們身負母國的完整公民權，或者另外建立了與母國體制一致，並在母國的最終控制之下的當地自治政府，便可被視為一種名副其實的國族擴張，一個國族在血統、語言、體制的領土擴大。⁴

簡而言之，霍布森所定義的「殖民主義」，便是一種國族的自然擴張，是母國人口自然外溢(natural overflow)的結果。

殖民主義，道地來說，是一種國族的自然外溢；它的測試標準即是殖民者移植他們代表的文明，到他們找到的新自然與社會環境的力量。⁵

而這類殖民主義的實行典範，最佳案例便是當時的加拿大與澳洲，不僅有英式自治政府，其統治的大多數人民也是英國殖民者的後裔，與英國有相同的國族認同

² 原文為：A portion of mankind may be said to constitute a nation if they are united among themselves by common sympathies which do not exist between them and others. 出自 John S. Mill,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Maryland, United States: Arc Manor LLC, 2008), p.179

³ John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republished in Nottingham, England: Spokeman, 2011), p.45

⁴ Ibid., p.47

⁵ Ibid., p.48

與文化。⁶

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之不同，則在於一個國族對外地的統治並非前述的「自然外溢」，而是強行施加自己的政治、軍事力量在其他族群與領土上。數個不同的國族與文化，被同一個政府統治，但被統治的國族在政治權力上，並不能與身為統治中心的國族平等，即為帝國的政治形態。霍布森在此提出另一種多國族共存的政治主張：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與帝國主義對比。他認為國際主義中的各個國族相互平等，並能以和平的貿易、交流等合作方式，達成各自共存的目標。然而帝國主義卻不主張各國族的平等，主導帝國的國族將被統治的其他國族貶低為「低等種族」(lower races)；為了己身擴張的貪念，與其他帝國針鋒相對；而為了與外國武力抗衡，便壓制國內的自由，鼓動對外仇恨與好戰主義。⁷跟一般的國族主義相比，帝國主義扭曲了國族的愛國心，使一個國族以愛國之名，壓迫其他國族的生存空間，剝削其資源與利益。與殖民主義相比，帝國主義則未能將國族中良善的文化與政治體制帶給殖民地，也未能將之融入原本的國族，而往往是以派遣總督或委託特許公司管理殖民地，放任他們在殖民地施行剝削原住民的暴政。這是霍布森定義下的帝國主義，與其他政治主張的關鍵差異。

經由上述的定義區辨，我們便可以理解霍布森何以用 1870 年代作為帝國主義興起的分野，並批判 1870 年代以後的英國帝國主義殖民行為。霍布森在《帝國主義》的第一章〈帝國主義測量〉提出，英國在 1870 到 1902 這段年間，帝國增加的新殖民地，佔帝國所有殖民地的三分之一；新增加的人口，則占了四分之一。⁸在這三十年間帝國的擴張速度，遠比 1870 年代以前快速。而英帝國對 1870 年後新取得殖民地的統治政策，也與此前大不相同。在這段期間內取得的所有殖民地，除了被併吞的川斯瓦與橘自由邦兩地有代議制度，或是成為被保護國(protectorate)，其他皆是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由英國設總督管理。這樣的政策不僅未能為

⁶ Ibid., pp.47-48

⁷ Ibid., pp.48-50

⁸ Ibid., p. 57



殖民地建立英式代議與自治體制，反而是以獨裁體制(*autocracy*)統治殖民地，造成英國民主精神的倒退。⁹儘管 1870 年代以前的英帝國也有擴張行為，1830 到 1870 年代的英國是以自由主義取向的政策管理帝國，傾向於減少殖民地的擴張、不擴張軍備、推廣殖民地成立自治政府的政策，而且 1870 年代以前也未產生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就這點而言，霍布森以 1870 年代作為帝國主義興盛的分水嶺，與他自由主義思想的邏輯是相符合的。

霍布森在《帝國主義》書中，將帝國主義理論分為經濟與政治兩個層面論述與批判。當代提倡帝國主義理論者，他們合理化帝國主義擴張行為的經濟理論，便是認為英國工業為了與歐美列強競爭，必須擴展殖民地，鞏固原料生產與市場。尤其在 1870 年代以後的英國工業已出現生產過剩的現象，必須有更大的殖民地市場，以便向其出口過剩產品，方能避免英國再度出現 1873 年的經濟蕭條問題。簡言之，帝國主義者相信帝國主義政策對英國經濟發展，是良性且必要的手段。如本文第二章所述，霍布森對此種理論，早已發展出一套結合傳統自由主義脈絡的反帝國主義，以及重視社會改革的基進主義兩種立場的批判思想。而霍布森在本書批判帝國主義經濟理論的方式，便是論證帝國主義僅能圖利寄生於各帝國之中的國際金融業者，對英國經濟無正面助益。

霍布森首先論證，英國在 1870 年代以後採取的帝國主義政策，及這段期間擴張的新殖民地，並沒有對英國經濟造成明顯的正面影響。這些新殖民地，多半是熱帶(*tropical*)與亞熱帶(*sub-tropical*)地區的殖民地，其進出口貨物的比例，都只佔英帝國總量的極小部分。倒是加拿大、澳洲等自治殖民地，與英國間的貿易額有明顯成長。¹⁰而英國在 1884 到 1903 年間的人口外移，有一半遷往美國，另一半則大部分前往加拿大、紐澳與南非殖民地，移民往其他殖民地的人口佔非常少的比例，也幾乎沒有成長。因此人口膨脹也無法作為奪取新殖民地的正當藉口。¹¹對比

⁹ Ibid., pp.61-63

¹⁰ Ibid., pp.65-73

¹¹ Ibid., pp.75-78

英國取得新殖民地的幅員與人口所佔帝國的高比例，這樣的獲利顯然不成正比。

若英國如霍布森所論證，未能從帝國主義政策與新殖民地得到利益，那麼這種無益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又何能推動？霍布森認為，帝國主義政策真正的獲利者，就是那些依靠帝國擴張，來保障自己在世界各地的投資獲利的資本家與金融業者。以霍布森書中這段文字，便能簡潔地解釋這個結構形成的原因與運作方式：

將錢放在國外土地上的投資者們，面臨著必須承擔與該國政治局勢牽連的所有風險，便希望能使用他們政府的資源來降低這些風險，並增加資本價值與他們私人投資的利益。這些投資與投機者之流，普遍也要求英國應該將其他國外區域納入她的旗幟之下，以確保有利潤的投資與投機之新區域。

12

霍布森指出意圖在本國以外地區獲利的投資或投機客，就是帝國主義的獲利者。這些人來自各行各業，共通點是他們能在母國的帝國擴張行動中，獲得更大的商業利益。

這就是推動帝國主義的各色經濟勢力的陣列，一個龐大鬆散的各行各業的團體，從軍事與行政機構的擴張，與軍事行動的開銷、新領土的開闢與貿易、以及供給這些行動所需的新資金中，尋求可獲利的生意與行情划算的僱傭，所有這些團體都在大金融家的力量中，得到他們的中心指引與領導的力量。¹³

這些人憑藉他們對國家經濟與金融的影響力，促使歐美先進國家走向帝國主義政策，擴展軍備、爭奪勢力範圍，以國家的力量，鞏固少數資本家與金融業者在外地的投資利益。¹⁴這個說法繼承了霍布森在《在南非的戰爭》書中，對南非政經局勢受資本家與金融業者操控，進而引領英帝國走向戰爭侵略布爾共和國的觀點。¹⁵

¹² Ibid., p.86

¹³ Ibid., p.89

¹⁴ Ibid., pp.79-91

¹⁵ 見 John A. 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pp.189-197, 198-205; John A. Hobson, *The Psychology of Jingoism*, pp.107-124



至於帝國主義者在政治層面的正當性論述，主要是以歐美列強的文明先進與優越，合理化其統治、殖民「低等種族」的作為。帝國主義者主張，帝國主義能幫助推廣英式的代議體制給世界的落後文明，傳播民主；受到演化論的影響，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則認為人類為了進化，必須與其他種族「生存競爭」(struggle for life)，因此較高等的種族以戰爭等暴力手段，將較低等的種族排除，是合乎「自然」演化進程的。¹⁶霍布森在《帝國主義》中，反對上述論述，但他的反對是立基於歐美列強的帝國主義，從未實際將民主與現代法治推廣給殖民地的事實，以及反對用任何暴力手段壓迫其他種族的和平主義理念。然而，他並沒有反對英國和歐洲的體制與文化比其他「低等種族」原本的文化更為優越的前提，他相信英國與歐洲的文明較為先進，這點他與帝國主義者仍是相同的，但帝國主義者的實踐方式與他的理想卻是背道而馳。

從霍布森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批判，可以理解他對何謂文明與進步的觀點。霍布森反對以生物學的「生存競爭」與物種進化的觀點，合理化人類社會中文明發展較為先進的族群，使用暴力、脅迫、戰爭的手段，消滅其他族群的行為。他相信人類如果要為了生存而「競爭」，應該是發展出新的、和平的生活方式，與舊的、野蠻的生存方式競爭。人類的文明走向，應該是往更以和平、理性的手段解決問題的方向前進，逐漸地拋棄暴力與戰爭，這樣才是霍布森認為的「進化」。

因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霍布森對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政治的批判，主要針對英國在 1870 年代以後採行的帝國主義政策。這段時期的英國殖民政策與官員，不僅無意在殖民地推行代議政治或教化當地人英國文明，反而更強化了對當地的剝削。他認為一個「合理的」(sane)落後國家文明化過程應該如以下敘述：

如果在漸進式的工業技藝與普及教育影響下，一個白人保護國(protectorate)內的諸多舊政治、社會與宗教體制式微了，這樣的式微也將會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伴隨著新制度的成長。這個過程並不以強迫方式實踐於保護國身

¹⁶ John A. Hobson, *Imperialism*, pp.159-160

上，而是從舊制度中發展出來，順應自然成長的法則，以令原住民能適應環境轉變後的生活。¹⁷

若帝國主義政策的政治意圖，是為了實踐「教化低等種族」的理念，那麼英國殖民者應該關心原住民的教育、健康、福利等問題，研究並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以人道主義的方式，引領原住民接受英國的現代政治體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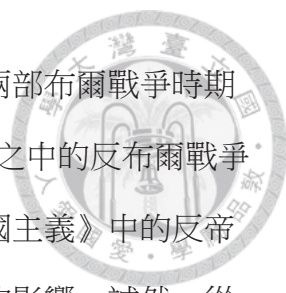
然而英國在殖民地的所作所為，卻是強迫當地勞工，為了少數殖民者的利益勞動，對於其健康與福利毫不關心。更有甚者，在第二次布爾戰爭之後，羅德斯便引進比當地勞工薪資更低的華工，至川斯瓦礦坑工作，壓迫當地白人與黑人勞工的工作權，使之更難爭取合理薪資與福利。這樣的行為，顯示帝國主義者口中所謂的教化、文明化，皆只是殖民者剝削殖民地資源與人力的藉口，而不是真正實踐的理念。帝國主義者在世界各地的作為，並不是為了將歐洲的先進文明與體制，帶到其他地區，建立對當地社會有益的長期制度；反之，帝國主義以教化作為藉口，以實際上專制、腐敗的政治體制來統治殖民地，以接近奴隸制度的不人道勞工待遇壓榨原住民的人力，掠奪當地的一切資源，最後利益皆落入殖民母國的少數資本家與金融業者之手。帝國主義不僅沒有促進世界往更好的方向進步，反而使人類文明的發展，倒退回暴力與掠奪的野蠻階段。

這便是霍布森著作《帝國主義》的意圖與結論，他要警醒當代人的帝國主義與愛國主義的不理性狂熱，將會導致世界走向衝突與戰爭，最終歐洲將自食惡果；他要導正歐洲文明的發展向暴力與侵略的錯誤方向，使其重返一個同時能兼顧傳統自由主義的國際主義理想，與社會主義關懷勞工階級福利的道路上。

第二節 《帝國主義》中的布爾戰爭論述脈絡

我們至此已檢視了《帝國主義：一份研究》一書的反帝國主義論述，從中應

¹⁷ Ibid., p.226



可清楚地發現，霍布森在書寫《帝國主義》的論證上，與他前兩部布爾戰爭時期的著作：《在南非的戰爭：原因與效應》與《好戰主義心理學》之中的反布爾戰爭論述頗有相似的論點。甚至我們可以斷言，霍布森在建構《帝國主義》中的反帝國主義理論框架時，受到他的南非採訪之行的經驗與觀點極大的影響。誠然，從第二章的霍布森早年思想與活動的敘述來看，他在選擇代表反布爾戰爭立場的《衛報》前往南非時，就已經在培養他的反帝國主義立場與論點了。因此談論霍布森 1902 年影響世界帝國主義理論甚鉅的《帝國主義》一書之出版，必須將他早年與基進主義社團的關係與他參與布爾戰爭經驗考量入整個脈絡之中。

《帝國主義》之中對於資本家與國際金融業者在帝國經濟中的「寄生」之控訴，其論述脈絡與《在南非的戰爭》一書中，霍布森將布爾戰爭動機歸咎於蘭德資本家與猶太裔金融家的利益，兩者理路是相當一致的。霍布森在《在南非的戰爭》當中，將放棄和平外交手段、挑起戰爭的責任，歸於英國在詹森行動後的殖民與外交政策的強硬化；而他又更進一步地透過對蘭德金礦、約翰尼斯堡一帶的資本家之研究，指控英國殖民政策強硬化的原因，是基於鞏固這些資本家利益的壓力。這樣的論點到了《帝國主義》之中，則被霍布森擴大到批判當代歐美資本家、猶太金融家為鞏固在全球殖民地的投資，以其經濟力量驅使英國和歐美其他列強等帝國，為此整軍經武，使全球皆走向帝國主義的擴張與好戰政策。霍布森在這兩段論述，都將資本主義的運作，視為導向戰爭和帝國主義政策的主要驅動者，而帝國政府、帝國官員、鼓吹帝國主義思想的一般民間人士，不過是受資本主義利益所在而驅使的次要人物。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不僅與霍布森定義的帝國主義息息相關，還是造成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政策在 1870 年代以後急遽擴張的主因。

霍布森將資本主義與階級的觀點帶入帝國主義理論之後，也突破了帝國的擴張謊言。在《在南非的戰爭》中，霍布森訪談並研究了約翰尼斯堡當地，爭取在川斯瓦共和國政治權利的勞工階級英籍僑民，結果他證實這些勞工運動者，與鼓



吹戰爭且具有實質影響力的資產階級並無往來，帝國政府與媒體只是炒作其議題，也不關心這些人的真實情況。英帝國將英籍僑民在川斯瓦的「不公待遇」，當作合理化干預川斯瓦政治與發動戰爭的藉口，實際上的目的與作為，卻與爭取勞工階級的權益毫無關係。到了布爾戰爭結束以後，賽西爾·羅德斯等南非資本家，在蘭德金礦引進薪資更低的華工，以取代薪資較高的英籍勞工。霍布森也特別在《帝國主義》中註明這個事實，以證布爾戰爭時期的論點。這證實了帝國主義對本國勞工階級無益，因為帝國主義僅關心資產階級利益，本國勞工階級亦是新殖民地被納入帝國體系以後，被剝削的其中一環。¹⁸

而霍布森另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論點，便是帝國主義政策為國際帶來衝突與戰爭，這點霍布森亦早在《在南非的戰爭》中，論述過布爾戰爭本可由和平外交政策避免，卻因為資本家的利益與帝國主義政策而迫使局勢走向爆發戰爭的結果。在《帝國主義》中，霍布森將當代數個歐洲列強，在 1869 到 1870 年間、與 1897 到 1898 年間的軍費支出列表比較，發現在 1897 到 1898 年這段期間的軍費確實增加許多。¹⁹這乃肇因於 1870 年代以來帝國主義政策在歐美列強各國之風行，使各帝國為了保護既有殖民地、爭奪新殖民地、確保勢力範圍畫分對己方有利，而不得不持續提升軍備，以便與他國競賽之結果。

霍布森在《帝國主義》論帝國主義帶來的負面效應，不僅及於對殖民地的經濟剝削與國際衝突，更延伸到帝國主義對國內自由與民主的傷害。帝國主義對從剝削受惠的母國何以有害？害處就在於帝國主義激起國內的好戰主義與極端的愛國主義等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懷有嚴重的排他性，以愛國的名義，持有這類理念者會主動妨礙其他質疑戰爭、國家、與帝國政策的言論之自由，破壞國內原有的民主與自由傳統。同樣的論點，可見於霍布森寫作《好戰主義心理學》時，對於布爾戰爭時期媒體與大眾輿論現象的批判。英國社會支持布爾戰爭、發表好戰、愛國言論的一方，在戰爭時期的公共言論領域中是較有優勢的；相對地，反

¹⁸ John A. 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pp.198-205, 229-240; John A. Hobson, *Imperialism*, p.243

¹⁹ John A. Hobson, *Imperialism*, p.147

戰一方的言論、出版與集會自由，雖然未受到官方任何限制，卻受到民間愛國言論一方的騷擾、抵制、甚至是暴力攻擊。因此在實質上，反戰言論的言論自由是受到壓迫的。帝國主義帶來的好戰主義與愛國主義之情緒，危害了國內多元的言論空間，傷害既有的民主體制。因此帝國主義不僅造成一個國家對外的剝削與暴行，同時也促成國家內部的文明之倒退。²⁰

霍布森對於何謂文明社會，有一套承繼柯布登式自由主義，與十九世紀末期的基進主義兩種思想脈絡的標準。從以上他反對帝國主義的論述，便可略窺一二。霍布森深信促進國家的民主制度、各地區經濟的工業化、提升勞工階級福利與生活水準、以及國際間的和平等等，才是人類文明進化的方向。在他批評當代以演化論、決定論或其他科學理論，合理化英國帝國主義侵略行徑的言論時，更將此種思想表露無遺。霍布森在《好戰主義心理學》即批評過歷史決定論的謬誤，他認為將十九世紀新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侵略、掠奪、瓜分資源與土地的事實，歸因於現代西方文明發展出的民主體制、工業化等成果較為優越，或是以神意、命運或歷史法則等決定論，合理化帝國主義惡行的成因與結果，皆是一種偽科學(pseudo-science)的錯謬論點。他在本書反駁十九世紀知名法國種族主義者德墨林(Edmond Demolins, 1852-1907)的論點，德墨林將英國與布爾人之間的衝突倒果為因，歸諸於「政治上不可避免」(the inevitable in politics)的歷史法則，視此為英國文明優越的證明。²¹霍布森反對這類種族主義的論點，在《帝國主義》之中，霍布森更進一步批評以「生存競爭」與物種進化的觀點，合理化帝國主義以戰爭、暴政的手段，侵略與壓迫其他族群的觀點。他相信人類如果要為了生存而「競爭」，應該是發展出新的、和平的生活方式，與舊的、野蠻的、戰爭的手段競爭。人類的文明走向，應該是往更以和平、理性的手段解決問題的方向前進，逐漸地拋棄暴力與戰爭，這樣才是霍布森認為的「進化」。²²

²⁰ Ibid., p.89, pp.129-136, pp.147-156

²¹ John A. Hobson, *The Psychology of Jingoism*, pp.79-96-

²² John A. Hobson, *Imperialism*, pp.183-185



然而霍布森批判當代帝國主義政策的殘暴手段與不公剝削，指出這不是「合理的」(sane)帝國主義，背後也就暗示了霍布森心中有一個判斷帝國主義是否「合理」的標準。我們可從上節引述霍布森談文明較其餘社會進步的帝國，應當如何引領原住民適應轉變後的生活一段，理解霍布森對帝國主義的批判，主要是基於一個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反對政府過度擴權，與同情弱勢族群的人道主義觀念；也基於他受十九世紀晚期的社會主義影響下，對勞工階級的關懷與批判資本主義剝削的意識形態。但這樣的批判觀點，並不否認西方文明優越於非西方文明的說法，而且顯示霍布森認為當代西方文明發展出的部分特色，例如工業化與議會民主制度，是必須用一個溫和的方式推廣給所有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

回頭看《在南非的戰爭》，即便霍布森同情，並試圖為工業與政治發展皆較為落後，文化與媒體皆較為弱勢的布爾人辯護，他的辯護觀點與辯護方式，卻是宣稱布爾人具有被媒體抹煞的理性，與追求進步文明價值的開放心胸；並且反證聲稱自己比布爾人更自由、更文明的英國社會，實際上的作為是反文明、反自由與反民主價值的。同樣地在《帝國主義》，他論斷西方帝國主義者與原住民社會雙方的是非，乃是用一把以「文明」為基準的量尺，鼓吹西方應當用更文明的方式，教導原住民社會文明。儘管霍布森如此批判帝國主義、如此批判當代的演化論者，但上述這些論證卻顯示：霍布森其實認同文明演化的思想，他認為非西方文明社會，應當朝近代西方發展出的民主體制、工業化等方向演進，他認為西方文明社會仍應扮演引領者，非西方社會應當作跟隨者。只是在教化的手段與過程上，必須符合自由主義的原則與價值。就這點而言，霍布森對帝國主義的認識與批判之深刻，顯示了他的思想相對於他的時代相當進步，並能跳脫既有國族與文化認同框架，反省英國與西方社會的問題。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他的思想、用詞與概念仍屬於他的時代，仍受到當代脈絡所影響。

本章小結



經由上述對霍布森反布爾戰爭論述著作，與其《帝國主義》之文本分析與比較，我們可清楚地看見兩者相連的脈絡，從其中共通的論點與概念，我們可以窺見這位帝國主義理論的早期締造者，如何地與他的時代相抗衡，又如何地受到他的時代所影響。而霍布森之所以選擇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與他選擇反對布爾戰爭的原因如出一轍，就是為了維護他心中的文明價值。在第三章中，我們從《好戰主義心理學》了解到霍布森對英國文明自我墮落的憂心與反省；本章討論的《帝國主義》裡，霍布森更進一步，表現出欲將他所珍視的理性、議會民主、自由主義、工業化等英國/西方文明價值，以國際主義的形式實踐於全世界。與當代帝國主義者合理化自己對其他族群的壓迫與剝削暴行相比，霍布森能夠正視、反省帝國主義的暴力與不公義之處，並分析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的關係與結構，在當代而言已經是一大進步。

結論



霍布森是最早以批判角度，將帝國主義概念理論化的學者之一。從霍布森寫作反布爾戰爭論述，到帝國主義理論的形成，我們可以看見霍布森個人的思想與關懷的發展過程，看見一位具有古典自由主義思想背景的英國文人，在愛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高漲的 1890 年代，如何地在當代的新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脈絡之中，尋找自身的路徑。在霍布森於 1889 年開始修正市場供需法則的經濟理論的同時，正好也踏入了一個英國政治與社會氛圍從崇尚自由貿易與自由主義，轉向提倡帝國主義政策的時代。面對帝國主義思潮興盛的挑戰，霍布森卻是力圖堅守自身的自由主義立場，吸收社會主義思想，意圖提出一套與帝國主義反向而行的可行之道。這條道路不僅是為了英國的利益設計，更考量了全人類文明的福祉，意圖改進當代受到剝削與迫害的殖民地的遭遇，促進西方文明所提倡的自由與民主價值在世界各個社會都得以真正實踐。

霍布森的帝國主義批判理論，並非橫空出世，或是在帝國中心的象牙塔遙想殖民地情狀所寫作而成。他親自到南非的英國殖民地與布爾共和國採訪九個月，以親身經驗與研究，理解到英國本土所接受到的南非資訊，對英國人理解南非問題有多麼偏頗的影響。而這些扭曲的資訊，則是出自於一個政、商、媒體互相勾結的利益共犯結構。這個共犯結構所欲達成的目標，便是促使大英帝國清除布爾人的政治獨立勢力，完全掌握南非的礦產資源、人口與領土。霍布森的採訪研究使他注意到這個結構在南非政局紛擾、與英國社會好戰主義、愛國主義情緒激昂現象背後的影響力，他的反戰論述便建立在使帝國主義政策背後的資本主義操弄者現形、還給受帝國主義剝削迫害的布爾人應有的公義之上。之後，霍布森的反布爾戰爭論述，也成為他建構帝國主義理論的重要基礎，我們可以從《帝國主義》中發現他對資本主義透過帝國之手，剝削殖民地資源、挑起國際衝突的批判，正是建立在他對南非殖民的理解之上；也可以看見他對以理性、自由主義傳統自傲



的英國社會，在帝國主義時期喪失對自由精神的堅持，受愛國主義與好戰主義煽動，宛如暴民社會的憂心忡忡。而理解了《帝國主義》繼承的反布爾戰爭論述脈絡以後，我們也更能理解霍布森對於近代西方文明價值的讚揚與維護，正是他大力批判違反這些價值的帝國主義，尋求國際主義來解決問題的原因。

在批判當代英國帝國主義的力道與意圖上，我們應當給予霍布森應有的肯定，他忠於自身的學術良知，不斷地研究、論戰、修正理論，就是為了替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人類文明與自由民主尋找一個能夠和平共存，又能同時維護各個社會的自由意志、尊嚴與利益解決之道。不過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霍布森真誠的人道主義、勞工運動關懷與自由主義民主思想背後，是他以十九世紀英國文化為中心，倡導以西方文明價值做為世界共同發展方向的家父長主義。他對帝國主義的批判，也因此侷限在對 1870 年代後英國與歐洲殖民政策朝軍事擴張發展之方向的不滿，而不能跳脫時代的框架，去檢視自由主義提倡的代議政治、工業化、與國際主義等概念之中，同樣藏有強加自身文化價值於其他族群的宰制意圖；不能察覺經濟與政治佔據優勢的國家，仍能以非暴力也非侵略的手段剝削其他經濟體；並且還以推動殖民地自治與建立以歐洲白人為主體的社會，合理化了 1870 年代以前英國對北美紐澳等地的殖民行為。儘管霍布森身處的時代脈絡，使我們可以同理他觀點上的時代侷限，但我們仍應在研讀其帝國主義批判理論時，謹慎地省思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究竟應當怎麼解讀霍布森的思想理論與學術成就？就今日學界研究帝國主義的成果而言，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理論，已經不足以涵蓋今日帝國主義研究的範疇，其定義與論證的問題也飽受後世學者的批判，不會再為現代學界採用。至於反布爾戰爭相關論述與研究部分，包括英國社會好戰主義的階級觀念，以及過度著重南非資本家的政策影響力的說法，皆受到許多研究南非史、帝國史與十九世紀史學者的批評，證明了霍布森的布爾戰爭研究有許多方法與解釋的錯誤或不足之處。



不過就帝國主義理論本身的發展史，以及與之交錯的十九世紀政治史與思想史而言，霍布森與他對帝國主義、反布爾戰爭論述的研究成果，依然可做為今日史學界研究的材料。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理論與反布爾戰爭相關論述，可以作為我們更深入分析這些出身自大英帝國最為昌盛的時代之人，何以挺身反對自己的國家屈服於帝國主義風潮的材料，也可以藉之探討帝國主義理論早期建構的起源與過程，理解當代學術的發展所面臨的轉折與處境。追溯霍布森建構帝國主義理論的學思脈絡，我們得知布爾戰爭對他有經驗與研究材料上的巨大影響，這應該能使我們更貼近霍布森批判帝國主義的動機，並更理解他定義及使用帝國主義的語境與研究方法，避免我們日後以其他定義或脈絡下的同一語彙，混淆十九世紀晚期的帝國主義相關討論。

本研究的成果，僅止於揭露霍布森《帝國主義》一書與他反布爾戰爭論述著作的關聯，而未能就當中提出的霍布森的文明價值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然而若能針對這個問題深入研究，或許能幫助我們了解那份十九世紀晚期的英國、歐洲的各家學派、各種左右意識形態背後，以西方中心觀為基礎的驅力。無論是帝國主義或反帝國主義，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在十九世紀的西方學界、政界中，皆有明確地視近代西方社會所發展出的自由、民主、工業化等價值，是全人類前進的唯一方向的意味存在。到了十九世紀晚期，許多流派甚至更期待一個具有國家效能的國際組織，負責實踐他們認同的價值(自然仍是西方中心觀點)，以此訂定世界秩序與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即使像霍布森具有批判帝國主義正當性的敏銳度者，他的批判仍是建立在另一種西方中心的文明觀之上。這使得十九世紀到一戰以前的帝國主義討論，無論正反雙方，俱不能脫離西方為尊的家父長主義心態。若本研究能夠作為文明觀研究的墊腳石，促進未來學界對此的理解和討論，就是令筆者非常榮幸的微小貢獻了。

參考文獻



一、史料

Hobson, John A. *Imperialism: A Study*, Nottingham: Spokeman, 1902(republished in 2011).

Hobson, John A.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London: MacMillan, 1900.

Hobson, John A. *The Psychology of Jingoism*, London: Grant Richards, 1901

Hobson, John A.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eretic*, New York: Routledge, 1938(republished in 2011).

Mummery, Albert F. and Hobson, John A. *The Physiology of Industry: Being an Exposure of Certain Fallacies in Existing Theories of Economics*,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89

二、二手研究

1. 書籍

Cain, Peter J. and Hopkins, A. G. *British Imperialism, 1688-2000*. 2nd ed. Essex: Longman, 2002.

Cain, Peter J., *Hobson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laeys, Gregory. *Imperial Scep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uthbertson, Greg., Grundlingh, Albert., and Suttie, Mary-Lynn., eds. *Writing a Wider War: Rethinking Gender, Race, and Identity in the South African War*.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2.

Eldridge, C. C., e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Gourvish, T. R. and O'Day, Alan., eds. *Later Victorian Britain, 1867-1900*.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8.

Hampton, Mark. *Visions of the Press in Britain, 1850-1950*. Illinois, U.S.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04.

Hyam, Ronald.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Lanham: Barnes & Noble Books, 1993.

Keynes, John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4

Krebs, Paula M. *Gender, Race and the Writing of Empire: Public discourse and the Boer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Lee, Alan J. *The Origins of the Popular Press, 1855-1914*. London: Croom Helm, 1976.

MacKenzie, John M. *Propaganda and Empire*.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Meredith, Martin. *Diamonds, Gold, and War*. Great Britain: Simon & Schuster, 2007.

Pelling, Henry. *Popul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New York: St. Martin's P., 1968.

Pelling, Henry. *Modern Britain, 1885-1955*. London: Cardinal, 1974.

Potter, Simon J. *News and the British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rice, Richard. *An Imperial War and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Oxon: Routledge, 2007.

Pugh, Martin. *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ish Politics, 1867-1945*. Oxford: Blackwell, 2002.

Read, Donald. *The Power of News: The History of Reuters*,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Seaman, Lewis C. B.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1837-1901*. New York: Routledge, 1973.

Semmel, Bernard. *Imper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English Social-Imperial Thought, 1895-1914*, Anchor Books: New York, 1968.



Smith, Iain R. *The Origin of 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 New York: Longman, 1996.

Stephens, John J. *Fuelling the Empire*. Chichester: Wiley, 2003.

Streak, Michael. *Victoria's Stepchildre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South African Problem, 1795-1899*. U.S.A.: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

Thompson, Leonard.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Warwick, Peter., ed. *The South African War: The Anglo-Boer War 1899-1902*. Essex: Longman, 1980.

Winseck, Dwayne R. and Pike, Robert M. *Communication and Empire*.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論文

Auld, John W. "The Liberal Pro-Boers", in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14, No. 2, 1975, pp. 78-101

Blainey, G. 'Lost Causes of the Jameson Raid',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8, No. 2, 1965, pp. 350-366

Cain, Peter. "J. A. Hobson, Cobdenism, and the Radical Theory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1898-1914",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1, No. 4, 1978, pp. 565-584

Eckstein, A. M. "Is There a 'Hobson-Lenin Thesis' o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olonial Expansion?",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4, No. 2, 1991, pp. 297-318.

Fieldhouse, David K. "Imperialism: An Historiographical Revision",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14(2), 1961, pp.187-209.

- 
- Gallagher, John. and Robinson, Ronald.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Vol. VI, no. 1, 1953, pp. 1-15.
- Koebner, Richard.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2(1)(1949), pp.1-29.
- Kruger, Daniel H. "Hobson, Lenin and Shumpeter on Imperialism",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6, 1955, pp.252-259.
- Morgen, Kenneth O. "The Boer War and the Media(1899-1902)", in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Vol. 13, No.1, 2002, pp. 1-16.
- Porter, A. N. "Sir Alfred Milner and the Press, 1897-1899", i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6, No. 2 (Jun., 1973), pp. 323-339.
- Porter, Andrew. "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 Context and Motive Reconsidered", in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31, No. 1, 1990, pp. 43-57.
- Wood, John Cunningham. "J. A. Hobs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42, No. 4, 1983, pp. 483-500.